



2142

蔣委員長著

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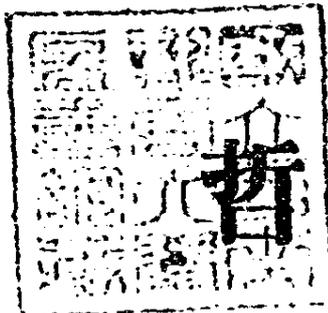
命

與

哲

學

吉  
日  
錄  
事  
料  
教  
育  
會



五五書店總經售

## 編例

蔣委員長의哲學觀，是他一切政策的出發點。要研究他畢生的思想系統，和目前的抗戰國策，都必須研究他的哲學觀，而坊間關於這種書籍尙沒有，所以編者把他有系統的搜集起來獻給讀者。

蔣委員長的哲學觀可以說是「唯行哲學」，這是繼承了而且是發展了 總理的哲學傳統，總理爲欲糾正中國「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的積弊，創「知難行易」的哲學，蔣委員長見年來「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惡習，於繼承「知難行易」的哲學發展爲「唯行哲學」。

七七抗戰以來，一切新的國策，具體的如「抗戰建國綱領」，頒佈迄今尙未全部見諸實行，即以動員民衆與各黨派間的精誠合作而論，這是戰勝日本強盜最不能缺少的必要條件，不然的話，要想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不但是不可能，而且是妄想。但動員民衆與各黨派

間的鑄誠合作，一直沒有做到完善的地步。

又如 蔣委員長「政治重於軍事，民衆重於士兵，後方重於前方，宣傳重於作戰，」這一些偉大的昭示，雖說在開始執行，但執行的程度與抗戰形勢發展的需要是千萬分的不夠。

因之在抗戰到了兩週年的現在，把 蔣委員長的「唯行哲學」廣爲宣揚，這是非常必要，這就是編者發行本書的目的。

劉 斐識 抗戰二週年紀念日

# 革命與哲學

## 目次

### 第一節 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一

日本是竊取了中國東西「致良知」拿來壓迫中國。怎樣的才是「致良知」？今後方策是「知難行易」的哲學而要闡明這個哲學就要看清「致良知」三個字。宇宙間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確定革命人生觀要以革命哲學為基礎。中國固有的倫理哲學與政治哲學是大學中庸之道。

### 第二節 革命哲學的重要……………一五

救國之根本問題在於恢復民族性而且要發揚光大。中國新民族哲學是「知難行易」注重於動的方面。處理事物要明瞭始終本末運用科學的方法。三民主義就是「明德」「親民」的道理。沒有革命哲學做基礎人生觀不確定思想和信仰便容易動搖。

### 第三節 怎樣復興中華民族……………三一

要自強自立就要恢復我們固有的精神 我們固有的精神乃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東方民族精神的存在今後完全寄托在我們中華民族身上 越是危險的時候我們的精神越要堅定

#### 第四節 研究中華民族致弱之由來與日本立國精神之

所在……………四三二

人貴知恥我們現在就要沉着準備求雪國恥 雪恥要全國國人從恢復民族精神做起 日本能「致良知」所以強盛起來我們不能「致良知」所以衰弱下去 我們求自強自立須從根本上着眼

#### 第五節 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

精神……………五三二

日本立國的精神是武士道而武士道又是中國儒教殘餘的東西 我們自己固有的民族精神不知保持所以國家弄得如此地步 日本已踏上窮途末路 我們只要奉行三民主義就能保全國家並可做世界和平之主 我們要復興固有的民族精神方能抵抗日本武士道

#### 第六節 政治的哲學……………七一

一、大學中庸與禮運為中國政治哲學寶典，而中庸哀公問政一章尤為治政的原理。

二、分段闡明袁公問政章的內容要義：

- 1, 政治要以人爲本，要以修養人格和推己及人爲推行的根本。
  - 2, 政治應該由個人對家庭社會和國家完滿負責做起，應篤行五達道與三達德，而以「誠」字貫徹到底！
  - 3, 說明修養人格的重要和效果，勉人努力自強，勿自暴棄。
  - 4, 列舉九經的功用和要義，說明爲政之道，在乎由內及外，使天下人由親及疏，各得其所，以達和平安樂之治。
  - 5, 一切事業開始以前須有預備，而原理原則，尤爲一切行動的前提。
  - 6, 政治原動力在乎「誠」，而完成「誠」之德性，在乎力學與篤行。
- 三、本章要義之總提示，與「誠」爲成已成物之詮釋。
- 四、中國政治哲學的精義：

- 1, 政治的理想和目的在提高「人」的品格，發揮「人」的價值和功用，修明「人」與「人」的關係，爲政在人，一切以人爲本。
  - 2, 政治哲學與倫理哲學相合一——政治以倫理爲基礎。
  - 3, 禮運篇爲「地方自治」之圭臬。
  - 4, 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目的在使人盡其才，各得其所，各遂其生。
  - 5, 中國政治哲學以行「仁政」爲本，故特別注重疾病、痛苦、困窮、的救濟。
- 五、希望大家究明政治哲學的精義，認清實際政治的本務，共同一致，篤信力行，來實現三民主義，完成建國使命！

## 第七節 行的哲學

九三

一、行的哲學為唯一的人生哲學。

二、過去所行不發生效果的原因，由於未認清力行的真諦，因而沒有信心，沒有耐心和決心。

三、「行」的本義是什麼？行就是人生。……要效法天行，自強不息。

四、行與動的區別……動並不就是行，動是臨時的，偶然的，他發的，行是經常的，必然的，自發的。……動有善有惡，行則無不善，……行是繼續不斷的，動是隨作隨止的。

五、真正的「行」是天地間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有目的，有軌道，有系統。

六、行的哲學無分於動靜，行是恆久的不輟的。宇宙皆為行之範圍。

七、「行」為「性」之表，與生俱來……人之生也為行而生，我們亦要為「生」而行。

八、行的目的，在場進人類生活，羣衆生命，民族生存，國民生計。

九、「力行」就是革命。

十、革命的動機在救人，革命的本務在行仁。

十一、行的要素是「知仁勇」……行的精神就是真純專一，貫徹到底，處危若安，履險如夷，這就是革命的精神。

十二、行的原動力是「誠」，行的表現在創造在進取，在建設，在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

，……行的愈致就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十三、要應用科學的方法，注重「行」的四大要件：

1, 必須有起點……要找到着手之點，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不可越級開始，要從基層做起。

2, 必須有順序，……定計劃，定步驟，認清時間環境與事件內容，在事先確實準備。

3, 必須有目的，……朝着正大光明的目的與確定的目的去做，不達不止。

4, 必須是經常的……革命力行只是平平實實的行爲，用不着別出心裁的方法，與投機取巧的企圖。

十四、革命成功必須要有做無名英雄的志氣，冒險犯難視作平常，茹苦含辛，行所無事，尤其要不間斷，不中輟，立志有恆。

十五、篤信 總理行易知難的學說，從力行中去求得真知，……「能知必能行」與「不行不能知」的意義，……唯有篤行纔是力行，唯能力行纔無所謂難事。

十六、祇要我們立定決心，抱着熱誠，照着我們信仰去力行，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亦必容易達到我們革命的使命！

# 革命與哲學

## 第一節 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

△日本是竊取了中國東西「致良知」拿來壓迫中國。怎樣的才是「致良知」

今後方策是一知難行易」的哲學而要闡明這個哲學就要看清「致良知」三個字

宇宙間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確定革命人生觀要以革命哲學為基

礎。中國固有的倫理哲學與政治哲學是大學中庸之道。

上星期講演過，日本人除了現代科學同槍炮以外，他們國內所有的東西，完全是學中國的；尤其在精神方面，更是完全學我們中國的。並且是學了中國的東西，要來侵略中國，消滅中國；須知他們用來侵略中國，消滅中國最大的武器，並不是有形的槍炮，而乃是槍炮以外無形的精神。

日本從明治維新到現在，經過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兩個戰役之後，割我台灣，佔我琉球，併我朝鮮，現在來侵佔我們東三省，居然在世界上稱爲五強之一。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強的原因，不是得力於歐美的科學，而是得力於中國的哲學。他們日本自立國以來，舉國上下，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麼？就是中國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他們竊取這「致良知」哲學之唾餘，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竟成功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我們中國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國的精神，拋棄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反給日本人竊去，拿來壓迫中國還來滅亡中國，這是多麼可恥可痛的事情！以後我們要復興中國，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凡是中國的國民，總理的信徒，就統統應有一個認識和決心，就是要把復興中國，抵抗日本的緊要武器，拿住在我們手裏，這纔可以成一個戰鬥員，纔可以成一個革命黨黨員，並且可以完成雪恥救國的重大使命。

今日要說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理，來闡明我們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譬如我們要問怎麼叫「致良知」？那就先要從怎樣叫不致良知講起。現在就拿「愛國」來說，我們知道一個人都應該愛他的國家，應該爲他的國家來犧牲。愛國家，爲國家犧牲，都是

個人良心上認爲應該做的事情，這就是「良知」。但是有些人知道國家應該愛，而却不能愛在去愛，知道應該爲國家犧牲，而却不肯去犧牲，這就不「致良知」。又如說，中國如果統一了，大家精神團結一致，日本人便不敢來侵略中國。這個理由，是今天稍有認識的中國人，沒有那一個不知道的，而且更是知道中國非急切統一不可，我們內部尤非趕緊團結不可。不團結，不統一，不但要給外國人欺侮，並且就要亡國。但是有許多人，儘管知道這個道理，而偏要只顧逞意氣，爭權利，就是在強敵壓境的時候，還要來乘機破壞統一，破壞團結，並且藉着這個機會來反對本黨，推翻政府，這就是不能「致良知」。所以我們今天要抵抗敵人，復興中國，完成革命，並沒有什麼困難，只是在我們的一念，只要人人自問這一件事是否應該以國家爲前提，如果與國有利，我們便應該犧牲去救國家，我們只要個個人照着自已良心所認爲應該做的事去做，則一切不好的動念；如個人的意見，私仇……都可以消除淨盡，這就是「致良知」。中國能夠個個人「致良知」，就可以消滅日本，拯救中國。

但我們看看，現在中國一般人是怎樣呢？沒有智識的人也罷了，所有號稱知識階級的人，尤其是本黨內部有知識的，他們所謂愛國，所謂救國，其行動是不是無異賣國呢？他們口口聲聲喊禦侮，喊救國，但一切行動，祇是破壞統一，破壞中央，試問沒有健全的中央政府

「又怎能禦侮救國？豈是他們真沒有「良知」嗎？我想不然，他們祇是不能「致」罷了。由此看來，要是中國人不能從各人的良知做「致良知」的工夫，國家一定是要被敵國來滅亡的。

今後救國的藥方，當然是我們總理「知難行易」的哲學。而要闡明這個哲學，就是要用現在所講的「致良知」三個字。比方我們知道革命是好的，我們就要不怕任何困難危險，爲革命去犧牲；我們知道愛國是好的，我們對於有利國家的事情，便要努力；對於妨害國家的行動，便要反對。所以古人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這個「惡臭」與「好色」的良知，是人人所有的，不過要實在去「惡」和去「好」，這就是叫致良知。如果好惡相反，那就是不能「致良知」。當此道德淪喪，人慾橫流的中國，要使四萬萬人統能做到「致良知」三個字很難，但是我們少數人，尤其是今天聽講的官長學生們，總應該有「知」，就應該有「致」，因爲祇有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乃可以救中國。只有能夠致「知難行易」的良知，纔能負起救國的責任。

王陽明「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哲學，同我們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是不是有出入呢？這是在講「致良知」之先，應該要深切了解的。總理發明「知難行易」

的原理，完全是要我們注重「行」字。因為總理生在滿清末年，與王陽明生在明季一樣，同是看着中國人中了幾千年來「知易行難」學說的毒，一般士大夫，不是學漢儒解經，就是學宋儒講性，結果只是空疏迂闊，無補實用，所以王陽明使用「知行合一」的學說，來醫治當時中國的民族性，而我們總理更進一步用「知難行易」的學說，要來啟發中國的民族精神，並用來實行他的革命主義。總理的意思，就是說，你們既知道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是好的，那你只要照我的「革命方略」去做，照我的三民主義去行，就一定能夠完成革命了。所以總理常講：「你們一般黨員只要照我所講的話，實在去行就好了，不要再去求另外的知」。他的意思即是：良知是我們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若說要求學問的知識完全，就要用許多時間，更是不易。求「知」既是不易，即是很難，後知後覺，以及不知不覺的人們，祇要跟着先知先覺的人們去行，就可以節省時間，完成革命。因為跟着去「行」是很容易的。照這樣說，王陽明所講「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覺，不待外求，而總理所講「知難」的知，是一切學問的知識，是不易強求，而知識的「知」不必人人去求，只在人人要「行」。我們理解了這點，便知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知，同王陽明所講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知，其為知的本體雖有不同，而其作用是要人去行，就是

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現在中國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所以要受日本人侵略壓迫，主要原因在那裏？就是一般士大夫自己不能做，不敢做，反拿 總理的三民主義、總理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來曲加解釋，弄得一般青年，無所適從。全國的人不能照 總理的哲學「行易」方面去做，祇是向着「知難」方面去求，這就是不能「致良知」，亦就是不能行，所以到了今日我們革命還不能成功。我們一般同志，要知道今天黨國弄到這樣地步，就是這一般曲解主義，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弄出來的。我們今天要救黨國，沒有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良知發現出來，本着我們自己的良知，照着我們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去做，這樣纔可以完成革命。

如果我們祇聽信一般士大夫咬文嚼字片段的曲解，與一般一知半解的理論家的亂宣傳，把 總理最純粹最良好的學說主義，弄得支離滅裂，以致一般國民和青年無所信仰，無所適從，實際的革命工作，反而沒有人去做，使得 總理的主義，一點也不能實行，這樣便是革命的罪人，亦就是 總理的罪人。革命之所以失敗，即在我們不能力行，不能力行 總理的主義，不能照着 總理的哲學實事求是去做，歸根到底，就是病在只求知而不能「致」。我們既經曉得這毛病的因子，我們就應該迅速醫治，且要對症發藥來醫好我們這沉痛的病根。

這纔不是別的，就是要實行「知難行易」的學說，就是要致「知難行易」的良知，而且要知道「知行合一」的「致良知」的學說，是與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不惟不相反，而且是相輔而行的。亦惟有能致「知難行易」的良知者，纔能實現「知難行易」的學說，纔可以挽救中國已死的人心。惟有重實行，纔可以醫治今日萎靡麻木，苟且推諉，革命失敗的毛病。如果是祇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之人，那是祇能亡國不能救國的。革命完全在實行，決不是在桌子上書面上做工夫，所以今天要挽回中國的人心，就是要致「知難行易」的良知，如要補救革命的失敗，亦就是要重實行。

國家危亡到現在這步田地，上海停戰以後，一般人以致負有革命責任的長官，學生青年們，無形中都把精神懈下來，甚至酣嗜作樂，若無所事，要知今天的停戰，不過日本人準備還未完畢，不得不與我休戰，而他以後對我們侵略壓迫必定格外來得利害，這是了解日本帝國主義及中日關係的人們都知道的。他們在中國沿海及長江的砲艦兵船，隨時都可以向我們攻掠，所以我們今天要保護領土，保護國家，保護民族，只有把大家愛國的良知發揮出來，全國一致去努力實行禦侮救國的良知。除此以外，便沒有旁的可以抵抗日本，亦再沒有方法可以來復興民族的。

一般所謂唯物論者，站在唯物史觀的人，聽見我這篇話，或許以為我是一個唯心論者，而不注重物質的。如果聽者真是這種想法，就沒澈底了解「致良知」的哲學，亦就會誤解「知難行易」的哲學。因為講「致良知」如果僅是講「良知」而不講「致」，不注重在「致」字，那就是一個唯心論者，亦就與知難行易的學說相反了。如果講「良知」而注重在「致」，論良知而注重實行，那就不能算是唯心論，陽明的學說所以與程朱專講心性者不同；總理的學說，所以與陽明的學說作用一致，就是在此。我在從前，將我實驗所得，作成一對聯語，請教過總理，那聯語就是這「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兩句話。

總理當時稱許的話，我可以不必多說，但他就親筆寫了這對聯語送給我，表示他獎勵後進之意，我可以對各位說，這即可以作為我的革命哲學。一個人生在宇宙中間，終日因緣接觸，都離不了事與物。在心與物微妙的關係中間，我承認一切的一切都裏從事實上客觀上來決定，所以我們絕對不是講唯心論的，我們也決不承認是一個唯心論者，同時却也不是機械的唯物論者。總之我們認定凡是從實際上把事業辦成，就要先從事物的方面注意，然後才生效用。不過我們要辦成功一件事情，要整理一種物件，決不能忘却自己的心意，如果離開了意志，是一件事都做不成的。比方革命是一件事情，如果我們心裏起一個叛變念頭，就立刻

可成爲反革命。又如我們曉得，革命一定要照建國大綱所定的原則去做，但是爲了權利一念的蔽惑，或爲投機取巧之計，就是迎合一般反動派的心理，放棄總理所定的原則，只爭個人權利，不管黨國存亡與革命的成敗，這就是由心意便牽累到事物，這即是一切事物不能隨心開意的明證，也就可以明白，要革命，要救國，是不能不「致良知」的，再舉例來說，我們本來人人曉得革命是好的，但在事實上，却又不能照着革命的道理去做，那就是行動與心意不能一致，這就是不能「知行合一」，就是不能「致良知」。又如我們大家皆知「知難行易」的哲學，是今日救人心救民族最好的學說，這個知道的「知」，就是「良知」，我們能夠實行這個知難行易的學說，這就是致「知難行易」的「良知」。總理常講，精神和物質是不能分離的。總理還把精神的意義，解釋得很明白，他說凡不是物質的東西，統統叫精神，從古至今，沒有人能下精神的定義；像總理這樣確切。所以我們要承認宇宙間除了物質之外，還有一個精神的東西存在；承認精神的存在，便承認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不過有「良知」，必能「致」，即是「行」，即所謂實現良知，亦即是「知難行易」的實行者。如此所謂「良知」，總不致於落空，才不會做一個空疏唯心論者，同時也不會做一個機械的唯物論者，所以我們對於哲學的態度，不能承認唯物論者，亦不能承認唯心論

者。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纔能創造一切，所以我們的哲學，唯認「知難行易」爲唯一的人生哲學，簡言之，唯認「行」的哲學爲唯一的人生哲學。所以我們要完成革命，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只有實行「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祇有實行「總理的三民主義，復興我們固有的民族性。」

關於革命哲學，和革命的人生觀，從前我們在日本亡命的時候，總理就要我切實研究，後來經過一二年的工夫，纔歸納出上面所說的一對聯說，纔把所研究的簡單的結果提示出來。所以革命不是隨便的衝動的事情，一定要有個革命哲學做基礎，革命哲學的基礎，也不是隨便看幾本書，研究幾天，便可以得到的，一定要經過許多慎思，明辯，篤行的功夫，纔可以構成一個中心思想。試問一般官長學生，你們革命的哲學是什麼？你們革命的人生觀是如的？你們有沒有革命哲學的基礎，如果你答不出來，那末你的革命思想一定是散漫的，游移的動搖的，就隨時可以隨着環境變遷，甚至可以變成反革命。所以我們如要成功一個真正革命家，始終不屈不撓的忠於革命，就要問我們有沒有信仰的中心？就是有沒有革命哲學的基礎？如果沒有，見着講唯物論的人，就跟着唯物論走；見着講唯心論的人，就跟着唯心論走，那種人，就不能成爲革命家，而乃是最沒用，最可恥的游移投機份子。所以我們革命

黨員最要緊的一個問題，就是要有革命哲學的基礎。

今天集合全南京的各軍事機關官長和學生們，特來作擴大紀念週，把這個最要緊的問題提出來，要請你們注意，你們如果要革命，無論遇到什麼危險，失敗，困難，疑怨，謗毀的時候，要都不致於動搖的話，那就要確定你們革命的人生；如果要確定革命的人生觀，就先要有革命哲學來做基礎，有革命哲學的基礎，才能心意安定，臨難不苟，至死不變的來革命。如果革命黨員沒有哲學的基礎，遇到危險困難失敗或疑謗叢集的時候，你就會隨時可以灰心，隨時變節，甚至朝秦暮楚，隨時可以使得革命人格墮落，所以我們不怕革命失敗，也不怕環境險惡，只怕自己把握不住，凡把握不住的人，就是沒有哲學基礎做我們思想和信仰的中心緣故。

今天所講的「致良知」三個字是我們現在實行革命主義最要緊的「心法」；不但不與總理的「知難行易」的學說相反，而且這兩個學說，是互相闡發，實是相得益彰之效。如果我們僅是講「良知」而不講「致」，那就像宋儒一樣，不免落於空虛。陽明所以要在「良知」上加一個「致」字，就是要從各人良知到事物上去切實體驗。所以「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證明「行易」，就是要實實在在去做，這就是大學的道理，也就是總理「知難行

易」的道理。一般官長學生同志們，要知道我們要不愧做一個革命者，要由我們手裏完成中國的革命，就得要站在革命的地位上，始終不渝，纔能承繼革命的歷史，就一定要有個革命哲學做基礎。所以我今天特別把它提出來，並不厭其重複申述，實則革命哲學的「體用」，幾句話就可以表示出來。就是：一個人生在宇宙之間，自然有一種向上的爲他的活動，這活動是起於心意，而著於事物。一天二十四點鐘，我們的心意沒有一時一刻不與事物接觸。我們要認識事物，就不能離開心意，就是精神。一個人離開心意，沒有精神，便成了一個死的軀殼，一個人成了一個死的軀殼，那還有什麼作用？更說不上有什麼革命。所以一個人有心意就有活動，而活動必須向上的爲他的活動。從這向上的爲他的活動，造成一種事業，就完成一個人。所以我對於人生觀，有一對聯語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這兩句話，也可以說是我的革命人生觀。我今天把我研究哲學和人生觀的經過說一說，我起初研究哲學的時候，很相信「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道理，我有一次就將這兩句話請 總理寫一副對聯，殊不知 總理搦了兩星期總不願寫，到兩星期以後，他把我叫去，却寫了另外八個字送給我，這八個字，就是「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交給我之後，也不說什麼，但是幾個月之中，在無形有形之間，總給我許多暗示

，要我自己覺悟，後來到了幾個月以後，他纔和我講這「天下爲公」的道理，并講「大學」和「中庸」的道理，他說我們中國自有很好的倫理哲學，和很好的政治哲學，「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哲學，乃是現代西方人所崇尙的哲學，弄不好，就是很危險的思想，大學中庸之道，才是中國很好的倫理哲學，和很好的政治哲學。我經過了 總理的指導，我的思想和信仰，纔完全的改變過來。但是 總理所講的哲學雖則注重中國的中庸之道，然而他做事的主張和方法，却是極端的，並沒有站在兩可之間的，舉個例來說，從前有一個朋友，就是邵元冲先生，有一次他想要到美國去，就問 總理到美國那一個地方去好？ 總理對他說：「你去須要到極東，否則就在極西，切不可站在中間，到那不東不西的地方，如果只到不東不西的美國中部，是學不到好的東西的。美國好的東西，不是在極西，就是在極東」。就此一點，我們可以知道 總理革命的思想和他教人啟發的方法了。 總理做事情，向來是極端的，不妥協的，然而他在哲學上却不偏不倚，完全講的是中庸之道，常說中國有很好的倫理哲學，政治哲學，中國人不能用，所以中國國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墮落，幾乎在世界中成了一個落伍者，如果我們把中國大學中庸之道整理提倡起來，世界中沒有那一個哲學能夠比得上我們的。 總理最後在日本一篇講演，便是講王道，都是說我們中國講王道，日本講霸道，

王道就是中庸之道，不講侵略，不講強權，完全是講公理，我們中國立國的積神同基礎，都是從這個哲學得來的。大學中庸之道是什麼？就是孔子之道，孔子之道，至漢儒而支離，至宋儒而空虛，至王陽明而復興，迨至我們總理而集大成，可惜我們中國人，自己忽略了自已，反被日本竊去了，要用來侵略我們中國。

但大家不要誤會，我今天所講的「致良知」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今天要革命，要抵抗日本，而不用武力，不要軍隊的話，須知我們要完成革命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軍隊，不過我們有了革命的軍隊，還要我們致革命的「良知」來使用牠，必使軍隊不腐敗，要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場上，必使槍砲不亂用，要完全用在革命的對象上，總之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尤其是現在中國民族精神這樣麻木頹唐，萎靡不振，而日本人已這樣來侵略我們中國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夠趕快把固有的民族精神「致良知」的哲學收回轉來，實行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以「知難行易」為我們思想信仰的中心，那末，革命是一定成功，中國是一定會復興的！

——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講——

## 第二節 革命哲學的重要

▲救國之根本問題在於恢復民族性，而且要發揚光大。中國新民族哲學是「知難行易」注重于動的方面。處理事物要明瞭始終本末運用科學的方法。三民主義就是「明德」「親民」的道理。信仰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就是「在止於至善」的道理。沒有革命哲學做基礎人生觀不確定思想和信仰便容易動搖。

凡是一個民族，能夠立在世界，到幾千年不被人家滅亡，那個民族一定有其立國精神的存在，就是所謂「國魂」。國家的生存與個人的生存，是一樣的，一個人若是沒有靈魂，僅剩一個軀殼，那個人就是一個死人，甚至反不如死人，僅有軀殼是沒有用的，國家和民族也是這樣的。立國於世界之上，他一定有一個立國的精神，就是國家的靈魂所在。日本之所以能夠侵略中國，到今天居然成爲世界上九大強國之一，他們的國魂，就是所謂「大和魂」；就是所謂「武士道」的精神，所謂大和民族，就是以武士道爲其國家的靈魂，所謂武士道

的精神，就是忠君愛國，尚俠好義之類。關於武士道的內容，下星期再詳細講。今天講的是：一個國家須有立國精神的必要，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立國精神，那是一定不能存在的。

國魂是什麼？就是民族的精神。凡一個國家總要有民族的精神，然後他的民族性纔能養成；沒有民族精神，他的民族性是無論如何不會養成成功的。沒有民族性的國家，那國家一定是散漫、腐敗，沒有組織，沒有機能，遇了外敵侵入的時候，國內的敗類，不但不能團結抵抗，而且還要投機取巧，做出種種賣國的行爲來，這就是現在中國的景象。中國如要立國在現在的世界，與列強競爭平等，如不趕快恢復我們的固有民族性，把我們中華民族數千年的立國精神復興起來，而僅是注重物質，那末，在這人慾橫流外敵侵略的時代，由個人道德的墮落，影響到全民族道德墮落，必然會使國家社會所賴以生存的東西——民族精神——民族道德，完全崩潰，而致國家民族於滅亡。我們國家和民族今天受了人家的壓迫，侵略，不惟漠不關心，恬不知恥，却還要在國內借這機會，來做他們爭權奪利的把戲，不管各國家侵略我們到什麼地步，不管日本人侵略是怎樣情形，國家是怎麼危險，一切都不問，唯一的目的，是在搗自己國家的亂，陰謀推翻國民政府，這是由於中國民族性的墮落，追源尋委，就因爲從前滿清入主中夏，用盡方法把中華民族整個的民族性，完全摧毀，所以三百年來，一直

到今天，中國民族性可以說是破碎無存！而全民族散漫懶惰，種種的腐敗情形，都暴露無遺，使得中國的國家到了今天，陷於不可救藥的絕境。

我們現在要禦外侮，救中國，根本的問題，第一就是要恢復固有的民族性。滿清時代不願中國民族有整個的民族性，現在我們就要把這已喪失的整個的民族性，恢復過來，不但要恢復，而且還要隨着時代的潮流，加以整理，以求發揚光大，養成一個新時代的民族精神，纔能養成一個新中國的民族性。

中國固有的民族性是什麼？從來立國的精神是什麼？現在需要的又是什麼？總理已經寫得很明白，就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什麼呢？在倫理和政治方面講，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來做基礎；在方法實行上講，就是「知難行易」的革命哲學，現在我們要恢復民族精神，要中國的國家民族復興就先要恢復中國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民族道德，尤其要實行總理「知難行易」的革命哲學來充實這個哲學的精神，推動這個哲學的效用。「知難行易」四字，總理在他的心理建設的著作上講得很詳細從前中國的哲學是講「知易行難」，所謂「知之匪艱，行之維艱」支配了幾千年中國人的心理及行動，遂成民族積弱不振的一個重大原因，到了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用能知即能行，能行即能知之說，以

挽人心而救時弊，後來又爲滿清所壓制，竟至爲日本島國所竊取，而仍無補於中國，直到我們總理纔更進一步發明「知難行易」的真理，把從前的哲學，完全推翻，成立了一個新中國的民族哲學，這就是總理空前的發明，偉大的創造。總理說我一生最大的敵人，無論那一個敵人，我都不怕，因爲沒有那個可以做我的敵人，但我們真的敵人是那一個？就是中國從前的學說：從前的學說是什麼？就是「知易行難。」因爲一個人儘是求知，不肯去做，所以弄得一切事情都腐敗下來，致受外人侵略，亡國幾次，「革命不能成功。」「這即是說我們最大的勁敵，就是從前「知易行難」的哲學。」所以總理又說：「人類有先知先覺，後知後覺，與不知不覺等分別，先知先覺的研究明白了，知道清楚了，只要大家信他，服從他，實實在在跟着去做，馬上去做就行了。」中國之所以積弱不振，就在多數人的腐敗懶惰，不肯去行，以致形成今日這樣墮落的境地。總理爲要打破革命的勁敵——「知易行難」，所以特創造「知難行易」的哲學補救他。「知難行易」的哲學，就是今天中國新民族哲學，有這新民族哲學的建立，纔可以恢復中國固有的民族精神，纔可以養成功整個的民族性，這纔能夠救中國。

日本就是以「武士道」爲其立國的精神，以「致良知」爲其民族的哲學。因爲這樣，所

以日本人能夠尚俠義，輕生死，能夠忠孝，能夠愛國家，保民族；能夠在東亞稱霸。中國白己本來有了這種好的精神，好的哲學，而不能保存，不能應用，反被人家竊去，拿來滅亡我們，這實在是我們民族的最大恥辱。

所以今後我們要抵抗外敵，洗雪國恥，完成革命，復興民族，非把我們固有的民族精神恢復轉來不可。要恢復我們固有的民族精神，就非把中國固有的民族哲學，整理起來，培植起來，照着總理創造的「知難行易」的哲學實行起來不可。如果我們今天不講禦侮，不講救國，不講革命，那就可以任他人慾橫流，任全民族腐敗墮落，毀滅下去。否則我們就要珍重這個哲學，保存這個哲學，應用這個哲學；這不但是立國的基礎，也是做人的基礎。王陽明所講的是「知行合一」，總理所講的是「知難行易」，統統是反對從前「知易行難」祇知靜而不知動的哲學。這兩個哲學，就作用方面說，可說祇是一個，因為統統是注重在動的方面，而且統統是注重在行的哲學。

「知行合一」與「知難行易」這兩個學說，在中國哲學源流上，究竟是怎樣的來由？要知道這點，我們就不能不講「大學之道」。大學說：「物格而後致知，知致而後意識，意識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中國幾千年

來的倫理哲學，政治哲學，都是從這裏出來的。所以中國的政治哲學，與倫理哲學，實無二致。要治國平天下，必須從格致誠正修齊做起，即此可以知道，我們要完成革命，統一國家，平定世界，若非先從格物致知上努力，都是不會成功的。「格物」「致知」之間，最緊要的尤其是「致知」，我在第三期同學錄中，有一篇同學錄序，想大家都已看過，這篇完全是拿總理遺教教給我們的道理，演繹出來，沒有多加一點我個人的意思。這篇序文裏面，我有兩句話說：「革命之學，大學也；革命之道，大學之道也。」大家要知道，革命的學問，並不是外國來的學問，就是一個中國固有的學問，我們一定要把哲學來源研究清楚，有了這哲學的基礎，然後我們的人生觀纔能確定。一切的榮辱、成敗、利害、生死纔能看透。所以要「致知」，所以要明白大學之道。如果沒有哲學的基礎，在倫理上，政治上就沒有確定的人生觀，一個人沒有確定的人生觀，臨到危險的時候，就難免於變節；臨到富貴貧賤轉變的時候，也難免於變節。這樣的人，是一定不能革命的。所以我們不要以為革命祇是隨便的一件事情，革命是要有革命的情緒，革命是要有革命的道德，質言之，就是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精神，是要有革命哲學來做基礎的。有哲學基礎的人，就一定有肯定的思想，亦就一定有中心信仰的人。有了中心思想和信仰，對於一種主義，至死不貳，這纔可以算是革命的信

徒。大學之道是怎樣呢？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就是一個人生下來賦有的德性。「明明德」就是不要使這生下的德性汨沒，而自己要知道去淬礪它、光大它，可以說就是要確定我們的人生觀。至於「在親民」，可以說，就是要喚起民衆，復興民族，使民衆的生活能夠向上，民族地位能夠平等。「在止於至善」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切行爲，都一定要到最好的極點爲止，即是要達到善的極端，纔是止於至善。再切近些說，我們一個人生在宇宙，最多活不到一百年，人本是一個爭存的動物，但因爲人類進化生來就是一種向上的衝動，利他的衝動，這一點向上利他的衝動，存之於心便是「德」，施之於物便是「善」。故「德」貴自覺，而「善」貴及人。自覺就是「明德」，及人就是「致善」。所以一個人有利他的傾向，便能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凡是一個人愛父母兄弟、愛人類、愛社會、愛國家，愛民族，都是一點利他性的擴充。不過人類每每蔽於私慾，泯其天性，所以要「明明德」，要「親民」，要「止於至善」，就是說，一個人雖然能自覺，能自強，能親親，仁民、愛物，但是還要「不息」。「不息」就是不做到最善的地方不止，即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意，這就是所謂大學之道。

現在再講「知止」的效用，并且把它譬喻解釋到我們講的主義上來。道「知止」的「止

「字，「止」就是止於至善；比方我們曉得三民主義，是我們中國唯一的救國主義，是最好最善的一個主義，我們就應該把其他一切思想、行動、統統集中在這三民主義上來，止在這主義上，無論其他什麼主義，什麼學說，統統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我們知道三民主義是各種主義中最好的，我們便信仰它，這就是「知止」，就是「止於至善」。既信仰了，我們有了確信，無論什麼學說主義，都不能搖動，這就是「定」。所以說「知止而後有定」。信仰既定，從此心安理得，所以說「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必須心安之後，然後能夠考慮，想出種種的方法，所以說「安而後能慮」。把事情考慮妥當，設計周詳，自然能夠實行得到，自然能夠成功革命，所以說「慮而後能得」。所以我說革命之道，即是大學之道。

總理說：無論那一國的政治哲學，都不及中國大學的政治哲學好。亦可以說 總理的政治哲學，就完全是體認大學，歸到時代的思想，而用現代科學方法，加以整理出來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更是現在的科學方法了。凡是一種事物，都有一個起頭與終點，這個自然的規律，即是現在的所謂物理。一件東西有一件東西的本末，有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的起點。我們處理事物，能夠知道這個自然的規律，照着去做，這就叫合理。合理就是「近道」，所以我們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先要注重物的本末，事的始終，如

要把這事情做好，一定要考察事物的起點在那一點，末端在那一點。還要知道，那一件事情應該先辦，那件應該後辦，不要先辦的拿來後辦，應該後辦的反來先辦，這就是科學的方法。總理學說就是用這科學方法完成的，所以便能合乎大學之道。中國的事做不好，中國的革命不成功，就是因為大家做事，不知道自然的規律，不順着合理的法則，一切公私行爲，顛倒錯亂，不是本末倒置，便是有始無終，這就不合現代科學方法，也就是不合大學之道。中國人無論做什麼事情，大都是不講本末始終，不知先後的，對於所有事物，既不研究，也不分析，遇着什麼辦什麼，辦到那裏算那裏，沒有計劃，沒有方法，這樣的辦事，那裏辦得通呢？就拿目前的事來說，比如今天有五千多人做紀念週，若是點名要一個個數起來，三點鐘也數不了，但把大家區分一下，政治學校的爲一區分，遺族學校的爲一區分，砲兵學校的爲一區分，步兵學校的爲一區分，各機關的爲一區分，軍官學校的爲一區分，區分之後，叫各區分的領導人自己分別去點名，不消十分鐘，就可以點好，一點也不會紊亂，這就是所謂條理；也就是所謂「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的道理。概括起來，就是說有組織，什麼東西都要有一個組織，譬如今天我們要辦一個學校，或要練一師軍隊，乃至要辦其他的團體機關以及一切政治的事情，統統都要有一個組織。這組織兩字，就可以把

本末始終先後的意思，表現出來。現在我們都曉得組織的重要，可是幾千年前，我們中國人在先早已發明這個重要的科學方法了，我們這一段話，就是要我們革命的人，知道革命的學問和方法；革命的學問和方法，不是一個粗淺的，隨便的，必要有一個哲學的基礎。這個最好的哲學基礎，就是現在的孫文學說，就是從前的所謂大學之道。知此，才能夠配得上講革命。所以說「革命之學，大學也」。我們要完成革命，就先要懂得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道理。我們要實現三民主義，就先要知道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方法。而止於至善的方法，更須體會「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效用。怎麼樣能夠把這個道理、方法、效用，應用到我們今天的革命事業呢？最緊要的就是要用現代的科學方法，如果我們革命沒有哲學的基礎，不照科學方法，那是一定不能成功的。

現在我再把 總理的主義學說與大學之道，參加對照的來講一講：大學之道，就「體」的方面言，是是從「明明德」做起，其次在「親民」，而以「至善」爲止。就「用」的方面言，是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做起，其次在「修身」「齊家」，而以「治國」「平天下」爲歸。 總理的「三民主義」與「知難行易」的學說，即是始於衣食住行之微

，而極於大同之治，所以知難致其知，而以行易致其用。所以 總理的主義學說，除形式上富有時代的色彩外，其本質、方法、作用，完全與大學之道相符合的。所以可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明德」「親民」的道理。要信仰「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就是在「止於至善」的道理。總理思想的來源，和他的哲學與主義的構成，的確是這樣的。就拿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道理講，我們要實現三民主義在今日的世界上，就定要從先治其國入手，國家治好，然後才講到世界。所以 總理說：「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堅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就是這個道理。所以要想治國，就是先要治家，「家」不僅是說一個狹義的家庭，以社會組織來說，凡是一個團體，一個學校，一個機關，統統可以作一個大的家庭看。一定要使得這些「國」以下的組織——家庭、團體、學校、各機關，皆能夠整齊，能夠一致，「家」齊了，這才能夠講治國。這一個齊家的「齊」字，從前有許多解釋，就我單的解釋來說：「齊」就是「整齊」之齊，所謂整齊者，就是不要散漫零亂。無論對什麼人，對什麼事，統統要整齊劃一，要這樣，才能夠說是齊家。所以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而齊家又一定先要修身。修身就是要使本身端正，一個人的身如不能修，就不能端正，那無論講什麼話，做什麼事，一定不能使人信服。所以

己重己人，重己重人。一定要像自己先立得穩定，譬如我們要教學生，教得下，當能當當的，必須持身端正，才能夠指揮一般部屬，修身又要先「正心」，正心就是不要有壞的心思，如果我們心不能正，到處祇是想利己害人，譬如我們到這學校來，團體和公益的事情，不想去做，祇是想先討好官長，討好學生，自己爭取一點權利，個人發展一點勢力，對於國家民族，絲毫沒有觀念，完全自私自利，這樣必就不正，這就什麼事情都辦不成。我們中國革命不能成功，無論在學校，在軍隊，在機關，一切的事情辦不好，是什麼道理？就是負責任的人，自己心沒有正；要正心，就完全要拿自私自利的臨礙觀念，根本剷除，完全以國家民族做前提，這樣心才可以正，才可以正己正人。「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要正我們的心，那就先要誠我們的意，所謂誠心誠意，就是沒有一點虛偽欺詐的意思。我們無論對黨對國，對朋友，對同志，對人類，應事接物，都要有誠意，所謂「不誠無物」者是也。所以有誠意才可以做事，才可以革命。「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這「知」不僅是指內在的「良知」之「知」，而是包括一切的知識。照現在話說，就是一切科學知識之知。凡是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都是「知」，都是「致知」。「知」要怎樣「致」呢？「致」就是研究，就是實行，就是說要實現他的所知，這就是致知。怎樣叫「格物」呢？就現在的

說話來講，「格」就是「分析」，「物」就是「事物」，「格物」就是分析事物之理。我們在「心」與「物」接觸的過程中，要用我們的知識把這物理一件一件分析起來，比如你問爲什麼要革命？我們就要分析所以要革命的內容，就是因爲國家危急，民族衰弱，不革命就要滅亡；還要進一步去研究，我們國家爲什麼糟到這樣的原因，我們民族爲什麼衰弱到這樣地步？這個衰弱的病源又在那裏？我們就把這個毛病一層一層分析出來，便知道由於整個的民族性的喪失，民族性的喪失，又是由於民族精神的墮落；民族精神的墮落，又是由於構成民族份子的國民腐敗、懶惰、苟且偷安、自私自利、不肯努力，這毛病的根源尋着了，又再進一步去研究，怎麼樣才可完成革命？就是要實行三民主義，這樣一層層的分析，這分析就是「格物」。所以說，「致知在格物」。格物了，就要一步一步的去做。所以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第一步應該怎麼樣做，第二步應該怎麼樣做，目的是在什麼地方？好的壞的事物，應該先做或後做的，都把他分析出來，分頭去做，這樣才合做人做事的原則。所以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個近道的「道」，換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主義」，「近道」的意義，就是說實行主義之期不遠的意思。這個道理在我們軍人，格外的要知道，無論是幹戰或幹軍事，一天事情不覺得幾多，到了打仗的時候，更不用說，如果辦事不爲先機變通。

那麼什麼事情都辦不了。所以我們一天做事，應該本着我們的知識，再照着科學的方法，先分緩急，再分輕重，來決定先後，給他一層層分出來，然後一件件的做起來。能夠這樣，那末，從格致誠正以至修齊治平，沒有一件不能做成功的。總之，總理之所謂行易者，就是要人去實行，不要人祇知而不能致，要致知；所謂知難者，就是人在易知之知處去求知，即是在內在之知「良知」所知者，去求實行。革命決不是祇要人去行沒有目的的壞事，知道他的目的，是要人自始至終去實行他所定的目的，到於至善為止的田地。所以「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完全是我們中國一個倫理的，政治的，澈上澈下的，有統系的道理。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治平天下，所以我說：「革命之學，大學也，革命之道，大學之道也」。我們們必須要知道，並且要實行這個大學之道，才能講做人，講革命，講救中國，救世界。

這一篇話，是總理親口所傳授我們，教訓我們的。從總理的遺教裏去尋求他的哲學思想，就可以完全看得出來，他的三民主義，他的革命哲學，可以說是拿大學來做基礎的。所以我們要做一個革命家，要做總理的信徒，不能，先要知道總理的革命哲學基礎之所自來，我們一般的同事，同志，學生，官長，要做一個革命家，做一個三民主義實行家，做

一個 總理的信徒，一定要能夠做到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不怕困難，不避危險，不苟且，不偷安，信仰主義終始不變，非有一個確定的人生觀不行。要確定人生觀，就要有哲學的基礎。所以我們除了講 總理的哲學，講陽明的哲學，還要明白大學生之道。現在國民黨員變節的不曉得幾多，口裏講革命，事實上行動上表現出來的，完全是反革命的，也不曉得幾多。爲什麼？就因爲沒有革命的哲學做基礎，人生觀不確定，思想和信仰便容易動搖。所以沒有革命哲學做基礎的人來革命，是一定危險的。我們交朋友，覓同志，認識部下，認識上官，最要緊就是先要考察他的思想，如果沒有正確的認識，我們時時刻刻就要指導他，並且要使得他能知道革命哲學基礎緊要，沒有革命哲學基礎的人，是不可與他做朋友同志，更是不可要他做命革黨黨員的。我今天特把 總理所講授的，和我自己所研究有心得的，講給你們，希望大家能夠澈底的理解認識。我們做革命黨黨員，要自己問問，革命哲學基礎在那裏？我們還要向朋友，同志，同學，問他，你的革命哲學基礎在那裏？大家這樣子，我們才能夠在一個互信之下來切實團結，抵禦外侮，完成革命，復興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我們中國的民族，國家，所以衰弱到這般地步，就因爲從前滿清摧殘我們民族性，不許我們有民族的哲學，所以我們今天要禦外侮，要民族生存，就是要趕快恢復我們的固有民族哲學。

有了民族哲學，就有民族精神，恢復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是恢復我們幾千年來固有的民族性。亦就是恢復我們的國魂，有了這個國魂，才可以抵禦外侮，完成革命，我們要想實現理想主義，完成我們的革命，不但今天雪恥禦侮救中國，還要救世界，救人類，使中華民族的能夠繼續我們五千年來光榮的歷史，而光大，而發揚。這偉大的使命，也就是你們大家共同的責任，希望你們大家覺悟，團結，興奮，前進，努力！

——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講——

### 第三節 怎樣復興中華民族

△要自強自立就要恢復我們固有的精神 我們固有的精神乃是一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東方民族精神的存在今後完全寄托在我們中華民族身上，越是危險的時候我們的精神越要堅定。」

本席上星期才從武漢回來，自離開南京後，差不多有七個多月不到本校同各位見面了。有許多學生，是這一學期才進來的，今天才初次見面，我心裏非常愉快，這兩星期來，有兩件比較重要的事情，要向各位報告。第一、是本黨三中全会開會，這次會議，到的委員有一百零六人，自我們總理去世之後，從來沒有這樣踴躍團結的現象，三中全会各委員，大家同心同德一致集合首都，共赴國難，這是本黨和國家最好的一種氣象，也就是中國革命前途很可慶幸的一件事情。

第二件，是對俄復交，我們對俄絕交已經五六年了，這五六年當中，外交上變化非常之

大，因為我們國內，不能精誠團結，國家不能真正統一，因此年來外交上受了很大的影響，受了很大的損失。自從九一八事變日本強佔東三省之後，可以說我們的外交是失敗了，不過這個失敗，是有形的，最顯著的，而在九一八以前外交的失敗，却是無形的，比較隱晦的。無論一件什麼事情，總要想到前因後果，預矚幾先。比方打仗，勝敗的決定，並不在疆場上打了勝仗，才知道勝利，或者打了敗仗才曉得是失敗，這種看法實在是太不高明了。從前孫子有一句話說：「決勝負於廟堂之上」，這是說軍事的勝負，在沒有打仗以前，早就可以決定，在沒有打仗以前，看看那一個準備得充足，那一個有組織、有條理、有精神，那一個就可以得勝利。治國家也是一樣，辦外交也是一樣，勝敗不是決於臨時的角鬥而完全在於平時的準備。今天我們還有一片乾淨土，做我們革命的根據地，還可以讓我們做恢復民族復興國家的基礎，現在對俄國復了交，我們更要自強，更要自立。古人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如果我們不欺侮自己，能夠自強自立，一定沒有人敢來欺侮的。我們中國外交失敗，國家民族之衰弱，受帝國主義壓迫，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不能自強自立，完全是由於自己欺騙自己，才弄到了今天這樣危急存亡的田地。今後一般國民尤其是我們軍人，我們黨員，格外要有自立自強的覺悟，格外要負這個救亡圖存的責任。我們黨員軍人，自己在這種國難

的期間，如果不激發天良，繼續我們先烈的遺志，來努力奮鬥，那麼我們就不配做一個人。我們總要記着，我們要想完成革命，實現我們的主義，要在現在世界上，能夠站得穩，做現代自由獨立國家的一個國民，那就非我們自立不可，否則我們只好自甘做一個亡國奴，那裏配做什麼革命黨員，配做總理信徒。如果我們自己能夠自強，不僅是東三省可以收回轉來，我們本着固有的立國精神和總理的三民主義，一定可以做一個世界和平之主。我們自己要知道，中國有這樣大的領土，這樣多的人口，更有五千年來祖宗遺交下來給我們這樣好的歷史文化，尤其是有總理研究下來這樣好的一個三民主義，只要我們能夠本着自強不息的精神努力做去，我們一定可以救國，一定可成功革命，也一定可以在世界上做一個和平之主。如果我們不能努力奮鬥，那我們真正是對不起總理，對不起父母祖先和本身。我相信我們一般教職員學生青年，一定有志致力復興民族的運動，實現我們的主義，繼承總理的事業，做世界和平之主。這一學期，剛進來的學生，大概還沒有聽過我的講演。本來在你們入學後第一次訓話，一定要講我們做人的道理，和做學生應有的行動，今天因為集合了前後期的學生教職員和首都各學校的同志，所以要待後來特別再講，今天是講一般的，即我們怎麼樣才能夠自強。

在未講自強以前，須先看我們有沒有自強的基礎。自強的基礎是什麼呢？第一就是要有自強的地方，即自強的空間，如果根本就沒有一個地方給我們做事情，那末就無論怎麼有本事的人，也沒有法子去表現他自強的能力來復興國家民族，而完成革命的事業。第二就是要自強的機會，和自強的時間，如果沒有的話，或者是有機會有時間而我們不知道利用，甚至方向弄錯，那麼就任你怎麼努力，也不會發生效力的，不能成功的。現在便拿這兩點，簡單的和各位同志講講。

第一、我們現在有沒有自強的空間呢？在上半部出發到武漢去的時候，我們還沒有自強的空間，現在已經有了。本來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就是在長江流域，尤其是武漢，武漢這一個地點，實在是我們中國本部一個中心的樞要之地，大家看我們中國近幾百年來的歷史，如果長江流域不能安定，那朝代的國家就建立不起來的。無論那一個時候，一定要長江上游安定了，統一了之後，才算奠定了國家的基礎。大家知道，明朝就是打敗了陳友諒，定鼎金陵，佔領武漢把長江流域統一之後，才建立起來的。太平天國的時候，曾國藩，胡林翼的計劃，也就是先要拿到武漢，來奠定一個基礎。長江上游統一了之後，他們的事業才能夠成功。當時太平天國也是定都南京，但是他一建都南京，內部就自己分裂，並且不能勵精圖治，趕

緊北伐，只是坐守南京，互爭雄長，所以被會黨藩胡林翼消滅。這都是因為他們自己沒有歷史眼光，沒有政治眼光，所以失敗。在今年五月以前，湖北及長江幾省的情勢，可以說是很不安定，就江蘇講，上海也幾乎全被日軍侵佔了，在那時候，實在沒有一個基礎給我們做復興革命的地方。但是這半年來，大局已經有了轉機，湖北河南安徽江浙第一期的工作已經告一段落，已經穩定下來了。我想我們將來同日本戰爭，一定是在長江以北，所以我這一次到湖北，先收拾皖豫鄂三省，就是這個道理。現在我們基礎已經穩定，對抗日本的基礎已經有了，只要我們自己能夠努力奮鬥，我們國家就不會亡了，這是在我們空間方面講。六個月以前和現在，國內形勢完全不同，雖然有許多地方，還是割據形態，不肯聽命中央，但是我們如果能夠把長江統一，革命有了基礎，不僅是對內可以統一中國，即對外抵抗列強的基礎也有了。我們自強的地方可以不要太大，只要它堅固只要它實在，那麼，我們無論內憂外患，怎樣厲害，仍舊可以恢復轉來，復興起來。只要以後努力奮鬥，我們便有了復興民族的基礎了。

第二點、就是現在我們有沒有復興民族的機會與時間呢？大家以為從去年起，內憂外患相逼而來，天災人禍接踵而至，國家將要滅亡了，將來很少希望，沒有機會給我們復興了。

但是，事實却不然，大家要知道，尤其是一般青年要知道，革命的祕訣即是成功於最危險的時候。我們一個人要做事業，就是在最危險最困難的時候才能夠成功。不經過困難，不經過危險。這種成完全是假的空的；要特別的注意這一句話，就是成功的機會，是在我們的危險中間，如乘我們沒有最大的危險，那就做不到最大的成功。現在我們國家的內憂外患天災人禍，已經危險到極點了，國家危險程度已經到了萬分，但是我們相信，一定在這萬分危險中間，把我們的民族復興起來，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統統是這樣，勝敗只在最後的五分鐘決定，並且是在危險的中間來決定的。你們大家如果要做一個革命黨黨員 總理的信徒，就要記住這一句話。危險既來，我們就要歡迎危險，不怕危險，才是我們革命黨的精神。最大的危險，就最能表現革命的精神，因為危險可以增長革命的決心和智識。中國有一句話說：「急則生智」。又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安樂的人，天天吃得飽，穿得暖，快快活活，一定不用腦筋，不會成功事業的。若是這個人受到危險的時候，他就一定要想出種種方法，研究出一個很好的道理，來救他自己，來救他自己的國家，這就是我們幾十年來，在戰場上和政治上得到的一個很好的經驗。危險就是自強的機會，越是危險的時候，我們的精神越要堅定，所以我們現在可說已經有了革命的機遇，有了復興民族的機遇，這個機遇就是

在我們天災人禍內憂外患當中。

現在再講我們要走怎麼樣一條路，才可以實實在在的於最近的期間，使我們民族復興起來？在未講我們自強自立的道路以前，就須認識清楚：我們的民族是在亞洲的一個民族，是一個偉大東方民族；如果這個前提不認定了，往往就會走錯道路，怎樣努力都不行的。大家要知道，我們東方民族有東方民族的環境，東方民族有東方民族的歷史，東方民族有東方民族的精神；如果拿着西方的精神到我們東方來用，那麼一定失敗。大家更要明白，西方人的精神用在科學方面是可以的，物質方面是可以的，但是用在倫理方面精神方面便絕對不行，這一點大家要十分認識清楚。我們東方民族現在立國的精神是什麼？就是 總理把中外古今的書籍研究起來融匯貫通以後，才發明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就是東方民族精神的產物。我們現在要自強自立，完成革命，當然只有奉行 總理的三民主義。 總理講得很明白，東方民族尤其是為東方民族之代表的中國民族，就是在「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八個字下面成功的；這八個字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固有的美德，也就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精髓。現在我們國家為什麼危險到這樣的地步呢？就是因為東方民族的精神，完全喪失了；好比一個人沒有靈魂，只有軀壳，當然不能生存一樣。所以我們如要做一個革命黨員，真正的要把中華民族復興轉

來，就要深切知道，如果丟掉這種優美的東方民族精神和文化不用，而要盲從西方的精神和文化，那我們民族就不僅不能復興，最後還是一定要滅亡的。

全部的三民主義，所有的救國道理，都可以用「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八個字來包括。我現在再把这八個字約成四個字，就是「禮義廉恥」。你們大家看，無論那一個興旺國家，譬如現在的德國、意大利、土耳其，沒有不講禮義廉恥的。就是蘇俄，雖然名義上是所謂共產主義國家，但實際上却絕對的是一個民族主義國家，也絕對要講禮義廉恥，始能立國。我們中國歷史就講過，俄國革命成功，就是民族主義成功；太平天國之失敗，也就是民族主義的失敗。無論那一個興盛的國家，尤其是在俄國，沒有不是絕對地用他組織紀律，即禮義廉恥來約束一般人民的。所以我們革命黨員要復興民族，完成革命，全靠做到「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個字，也就是現在我所講的「禮義廉恥」四個字，更具體的說，就是「紀律組織」。

A 如果沒有紀律則秩序紛亂，社會不安，政治不能上軌道；有了紀律然後有組織，要成功一個現代的國家，就要有紀律和組織。紀律這東西還是空的、死的、沒有精神的，所以一定要有一個精神，使紀律有活的力量，這個精神是什麼？就是要知道廉恥，沒有廉恥就可以盲從。這會於革命軍正在上海打敵人的時候，還要搗亂，還有漢奸來幫助敵人。所以我們有了紀

律，還要有廉恥來守紀律，沒有廉恥，那紀律就不能存在。又如一個學生做了不規則的事情，開除出去，這個學生如果以為開除我不要緊，這就是沒有廉恥。要知道一個人進到學校或軍隊來，就要與軍隊學校共存亡，同生死，如今被斥於團體之外，還恬不知恥，這種人一定到東也站不住，到西也站不住，到這裏也不守紀律，到那裏也不能守紀律，總之一個人沒有廉恥就不能守紀律，不能守紀律，就不能做一個健全的人。其次講到組織，沒有組織便沒有力量，便不能圖存，所以組織很重要，組織自然要靠紀律來維繫，然而尤其要靠有一種基本精神來作基礎，這基本精神就是「禮義」。沒有禮義，那組織是絕對不能存在的。現在如一般學校的學生，看先生是他傭人一樣，一點禮貌都沒有；不消說，看他的父母也是傭人一樣，回到家裏，還要父母送茶飯給他吃，不曉得父母生育我撫養我是何等勞苦，何等恩惠，家庭有這樣的子弟，還成一個家庭嗎？學校有這樣的學生還成一個學校嗎？學生之所以能存在，因為有一種禮義的組織；家庭之所以能存在，因為有一種禮義的組織；國家之所以能存在，也是因為有一種禮義的組織。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我們要復興民族，完成革命，實現主義，打退日本，要做世界上一個和平之主，我們就要從「禮義廉恥」做起。

凡是復興的東方民族，如土耳其和日本等，其民族精神，就是「禮義廉恥」；就是總理所講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不過和平被日本破壞了，所以他一定站不住，他拿禮義廉恥四字，總算把民族復興過來了，現在他不仁愛，不和平，完全拿西洋的而且是已經落伍爲現代西洋人所不取的精神，我看日本遲早一定是要滅亡的。滅亡之後，東方總要有一個國家，維持東方和平，來做一個東方之主，這當然是我們中國。日本滅亡就在目前，無論在他的國際形勢講，在他自己的精神上講，統統要滅亡，但是他滅亡，我們東方民族難道不能存在，都隨着日本滅亡嗎？這不會的，東方民族自有東方民族存在的精神，這個精神不會滅亡，東方精神是寄托在我們中華民族身上。總理說：我們只要有三百人，就可以復興中華民族，完成中國革命。現在我們難道不可以復興嗎？當然可以的。我們現在眼睛可以看到日本的滅亡，可以講，日本的失敗，就是我們的成功。所以我說復興的機會，也就是在我們面前，我們如果不能照着禮義廉恥做，不能將紀律組織，照科學方法來實實在在的做，那我們就要被日本消滅，復興東方精神的責任，就不能担負起來，東方民族五千年歷史，也會完全失敗在我們手裏；那麼，我們就做了東方民族五千年歷史的一個罪人了。

我們努力的方向已經決定了，復興的機會也有了，基礎也穩定了，只要我們自己努力。

努力怎麼樣？我在出發以前曾講過，我們只要照着「禮義廉恥」四個字做。

我這一次回來，你們要來歡迎我，後來我打電報來拒絕，因為我們現在有什麼可以歡迎？只要我們個個人照總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做，個個人照禮義廉恥做，便比什麼歡迎都好。在今天講堂裏的人，你們個個人有復興民族的責任，將來如果國家滅亡，你們個個是民族的罪人！我們當然不願意做罪人，我們要繼承總理的主義，民族的歷史，在世界上做一個世界和平之主，在東方一定担当復興東方民族的責任。我們要做，我發給你們這套力行叢書，希望你們一定要努力實行。我這一次看到你們因為天氣稍為冷一點，就有在街上冷得駝起背來走路的，還真使我難過，我們要有「柏松後凋」的修養，越冷越加有精神才好。要格外記住，我們要做一個國民，要做一個革命黨黨員，無論態度、言行、一舉一動，不可以苟且一點。你看無論那一個復興起來的國家，他出來的學生、國民，一定胸部挺出來，走路時兩眼一定向前，頭一定抬高，沒有駝背縮腰那種怪象。剛纔我講過，越危險的時候，越可成功。我們看一個學校好不好，一個軍隊能不能夠打勝仗，就看他最熱最冷或最窮的時候精神怎麼樣。

一個軍隊、學校，要造成成功好環境，不許骯髒，四週要整齊清潔，我們師長、團長、

參謀長、值日副官，應該天天巡視，軍務總要能「綜理密微」才有進步。我們爲要打仗，要拿生命去拚，所以平時要愛惜生命，要儘量減少生命的危險，所以平時教要教得很細密，保護要保護得很周到，所以管理要很微密，衛生要講究，纔能夠打仗；不是出出操練習射擊就算軍隊，尤其不要以爲軍人是一個粗人，其實不是很細心的人就不能做軍人。還有軍隊就是一個家庭，我們官長要看士兵如一個家庭內的子弟，一切官兵看軍隊裏的東西，也要如家裏的東西一樣，軍隊要有體面，不僅要在會場內整潔，營房以外四周環境一樣也要整齊。最後，你們如果聽到我來了以後，講了就做好，我離開了南京，又成了另一個樣子，那就不配做現代的國民。你們要知道，先生師長教你們費了多少力量，這種話沒有旁人指教你們，大家如果把這種話只是聽了就算完事，這就沒有良心，不能成爲一個人。所以我希望你們個個人能夠接受我的志願，接受我的教訓，實實在在從行動上做出來，不好有一點苟且，苟且一點是會給人家看輕，凡我所講的，很希望你們切實做到。

## 第四節 研究中華民族致弱之由來與日本立國精

### 神之所在

△人貴知恥我們現在就要沉着準備求雪國恥 雪恥要全國國人從恢復民族精神做起 日本能「致良知」所以強盛起來我們不能「致良知」所以衰弱下去 我們求自強自宜須從根本上着眼

今天是五九國恥紀念日，同時也是 總理的紀念週。我們的國恥，在中國一部被帝國主義侵略史中，以日本給我們的國恥為最大。除五三、五九、五卅之外，在歷史上還給日本割了台灣，佔了琉球，滅了朝鮮；而且割地之外，於甲午庚子兩役，還索取多額的賠款。在各通商口岸，甚至在我們內地，還沒有多處的租界。從甲午以來，同胞們給日本人殺死的不知凡幾，無形的經濟和文化方面，中國生命財產直接間接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損害，更沒有數量可以計算。這些國恥，是從那裏來的呢，是不是日本的國土比中國大呢？人口比我們

多呢？或者他們民族的精神比我們優良呢？不是的，日本是後開化的民族，三島的土地比不上我們四川一省大，人口更沒有我們這樣多，但是爲什麼我們却反來受他們這樣的欺凌呢？前恥尙未伸雪，到今天我們的東北和淞滬，又受日本鐵蹄的蹂躪，更釀成這種空前的恥辱，這種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中國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有這樣好的錦繡山河，和四萬萬優秀的民族，數十年來，竟遭這小小三島的倭寇壓迫，欺侮，使得中國的國家民族在世界上沒有一點地位，這不僅是對不起我們總理與已經死了一般先烈，而且反省起來，又那能對得起我們自己！天地父母，生我們下來，是不是要我們受人家的欺侮與壓迫呢？我想一定不是的。一個人生下來，當然有一個人格，沒有人格的人，就不能算是一個人。有人格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知恥；不知恥的人，就是沒有人格，不配做一個人，更說不上做一個革命黨員。我們今天既受了這空前的恥辱，果甘於忍受，不認自己是一個人，這就是算了，否則，如認我們自己是父母所生的有人格的一個人，不忍甘受這種侵略與欺凌，那就應該負起責任，去湔雪這個恥辱。古人講：「不自由，毋寧死」。我們的國家不自由，民族不自由，我們就應該不顧一切，一致起來替國家民族爭自由，否則我們一個文明古國，黃帝的子孫，竟化他傀儡偷苟安于今日世界之上，我們還有什麼面目見人呢？要知國恥一天不雪，我們在現

在世界上，便一天沒有地位，便一天沒有面目見人。尤其是我們一般負有保國衛民責任的軍人，比旁的國民的責任格外加重；並且要知道，這恥辱也可說是完全由我們不肯的軍人不爭氣造成的。因為我們少數軍人自己腐敗、懶惰、頹唐、浪漫、畏難苟安，祇顧個人權利，對於國家和民族的恥辱，以及黨的恥辱，完全如秦人覬越肥瘠，漠然毫不關心，這樣的軍人，如何還能夠雪恥救國呢？所以我們要覺悟，要反省，別的不必責備，自問是否可以對得住自己？我們的國家民族既遭了這樣空前的恥辱，我們還不同越王勾踐一樣去臥薪嘗膽，求雪國恥，我們還算得是一個中國人，必須每天二十四點鐘時時刻刻都要拿這國恥二字記在腦中，不要做過紀念週就算完事，甚至給人家笑罵也無所動於中，我們都是武裝同志，我們都是黨的軍隊，受過總理遺教薰陶的人，如果我們尚不担負這個責任，旁人那裏還能夠担負呢？我們應該從今天起，尤其當着這個國恥紀念，更要刻骨銘心，如果國恥一天沒有消雪，我們便沒有一天可以安樂自由，能夠這樣上下一心，全國刻苦，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沼吳，我們少則三年，多則五年，也一定可以洗雪國辱，一定可以使國家和民族達到獨立平等的目的。到那時候，我們的責任，才算是完成，才得對起總理，對得起一般死了的將士，以及我們自己的祖宗父母，才不愧為中國的國民，不愧為國民黨的黨員。

雪恥要從什麼地方做起呢？就是要從我們本身做起，我們中國人沒有國家的思想，沒有民族的觀念，是最危險的一點。我們必須完全站在國家民族同黨的立場上，團結一致來奮鬥，有了誠信剛毅忍耐果敢的精神，然後與敵人抵抗，才能發生如總理所講的以一當十當百的效力；才能打破一切的敵人，完成我們革命的使命。中國人第一件最壞的性質是自私自利，所以成了苟且偷安麻木萎靡，不能奮發自強的民族，又因為自私自利，所以只講個人主義，爭權奪利，把自己的利害，完全置於國家利害民族利害與黨的利害之上。這個毛病的總因，就是國民沒有國家民族的觀念，將中華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完全喪失殆盡，所以弄到今日這樣的衰弱，幾乎瀕於滅亡。中國國民如不能革去這個大毛病，就永遠救不轉來；就永遠要受日本人的侵略壓迫，沒有報仇雪恥的希望。但這毛病，是不是容易革去的呢？是不是一定不能革去呢？我相信如果我們大家都有一個救國家救民族救黨的志願，都知道我們固有的民族精神，是復興民族的惟一金丹，人人以恢復固有民族精神自任，我相信這毛病就立刻可以革除。我們就從今天起，應該以恢復固有民族精神自任，拿復興國家民族和本黨的責任，完全擱在我們自己的肩上。有了這樣的抱負，所有一切個人的私仇，與個人的成見，自然可以消除，一切個人的利害，自然會放在國家民族和黨的下面。無論官長學生士兵，那一個

不耐勞耐苦，就是一個亡國奴，那一個要貪樂，懶惰，不能誠信剛毅，也就是一個亡國奴。我們要救國，就先要救民族國魂，要救民族，就先要救民族性；所以必要先從自治、自強、以恢復固有民族精神做起。日本人是一個什麼東西，這次在上海作戰的時候，我們軍隊安全撤退了一天之後，他還不敢前進，而且還不知道我們軍隊撤退的行動，這算是什麼軍隊，我常常說，敵人無論如何強大，我們都不怕的，祇怕是我們自己腐敗，自己懶惰，自己將民族精神喪失，沒有國家和民族的觀念，所以我們要救國，要雪恥，沒有旁的方法，就是與大家以復興民族精神自任，團結精神，統一意志，一致向前奮鬥。

古人有句話說：「攻心爲上」。我們要打破敵國，就是先要打擊敵人的精神，如要打擊敵人的精神，就先要明白敵人精神的所在。所以我們要知道，日本之所以能立國，而且能到今天這樣強橫的地位，竟然做了世界上五強之一，從前已是割我們的台灣、琉球、朝鮮，今天又來侵略我們東三省，和侵略我們上海，不是別的，完全是拿我們中國的東西，來打擊我們中國。他拿了我們什麼東西呢？他除了新發明的潛水艇、飛機、新的科學，是從歐美學來之外，其他所有的東西，統統是學我們中國的。尤其是學我們中國的精神——哲學——就是竊取王陽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哲學之唾餘。日本自從所謂明治維新以來，無論

將軍軍人，陸軍軍人，從他天皇起直到他的兵士，以及凡受過教育的國民，統統拿「致良知」三個字做他們的民族精神的基礎，所以他能夠尚俠好義，忠於愛國，今天能夠在世界上稱雄，能夠侵略我們中國，壓迫我們中國，而我們中國人，自己有這樣好的寶貝，有這樣好的武器，却完全視如糞土，棄之如遺，反讓她學了去，拿來打我們中國，這就是日本人拿了我們的民族精神而反來消滅我們民族精神，這真是最傷心的一件慘事！

反轉來看我們中國人的腐敗、懶惰、麻木、頹唐、自私自利、偷生怕死，不肯犧牲，不愛國家，不知廉恥，就是不能「致良知」，就是不能「致行合一」，亦就是不能實行「知難行易」的哲學。日俄戰爭的時候，因為日本軍人能「致良知」就不怕死，所以能戰勝俄國。又因為日本的人民能「致良知」，能愛國家，能服從法令，能嚴守紀律，所以他的國家，便能夠強盛。「良知」是我們個個人都有的東西，父母生我們下來，是一個人；凡是一個人，一定都有「良知」。我們能夠知道善善惡惡，能夠知道這個是好的，那個是不好的，這個是可以做得的，那個是做不得的，這就是良知。個個人知道什麼事可以去做，而偏不去做，什麼事不可以去做，而偏要去做，譬如腐敗、懶惰、自私自利、賣國叛黨，都是人人都知道是不好的事情，不應該做的事情，而偏要去做，這就是不能「致良知」。因為中國人不能「致

良知」，所以國家民族便弄到還步田地。但是日本人到現在，所謂致良知三個字的精神，亦已經慢慢地墮落下去了，爲什麼他這種精神已經墮落了下去；而我們還不能打敗他，他還能來侵略壓迫我們呢？這即是由於中國人不能「致良知」的緣故。日本人知道愛國，而我們不知道愛國，這就是我們不能打敗日本人，而我要被日本人壓迫的緣故。所以我們要曉得，惟有「致良知」才可以復興我們的中國，惟有「致良知」才可以打敗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復興中國，要滴雪恥辱，並不是很難的事，日本拿我們的武器精神來打我們，我們祇要能夠恢復我們固有的精神，仍就可以拿我們的武器去打日本。下一星期，要對你們講「致良知」與我們總理「知難行易」的道理，今天我先提了頭，你們且先記住，我們惟有用「致良知」三字，才可以雪恥，才可以救國。

現在我們且把眼前關於公的方面的日常事務來說說：無論在學校裏，在軍事委員會裏，在各機關裏，一切主管長官，所用的職員，是不是個個人能夠愛護公家物件，如同愛護自己的一樣。公共物件是什麼？就是我們國家的一切工具；我們如果不愛護公共物件，就是不要愛護國家。就人的方面說，任用職員，不管他有沒有學問能力，他的態度行動，像不像一個軍人，也一切不管，甚至不能稱職，不能盡責，乃至影響一切公務不能推進，中國之所以降到

今天這樣貧窮，一切人事不能整理，原因就是在此，這就是由於不能「致良知」。以後各人自己問一問，我們是不是有這毛病？如果我們知道我們的毛病太多了，我們便要本着我們的良知，立刻去改正才好。

再把我們學校裏的情形來看，大家學生的精神，在天晴時表面上好一點，下雨下雪時，就格外的不像樣子。穿了雨衣，不扣扣子，戴了雨帽，不戴軍帽，這完全不是一個軍人的動作，不像受過教育的軍人，這完全是我們軍界的罪人。表示軍人最榮耀的是什麼？就是軍帽軍服。因為軍帽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戴的，所以你戴了軍帽，穿了軍服，不成樣子，就是我們軍隊的罪人，也就是喪失我們國家的體面，以後務要打起精神，改正過來才好。

衛兵不是隨便的新兵可以做的，一定要有常識，很老練，懂紀律，要衛兵盡職，軍風紀才能不壞。現在的衛兵，尤其是衛兵司令，完全沒有常識，不照規則，不肯勤勞，帽子可以隨便不戴，勤務兵隨便給他出去，鈕子都不扣，站隊也站不齊，職責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你們要知道維持軍紀風紀要點，必須要先從衛兵的教育嚴格下手，始能辦到。此後各機關學校，最要緊的就是整頓衛兵，尤其總值星官，格外要負責去整頓。衛兵關係軍隊的生命，無論官長學生，統統要守衛兵的規則，統統要尊重衛兵，不能說衛兵的階級比我小，就可以

隨便輕視他，有許多人進來，衛兵向他敬禮，官長却不還禮，這是絕對的錯誤，簡直失了官長的體統。

我們要整頓一個軍隊，不僅要在形式上去注意，我們要整頓軍隊，一定要在精神上、內容上、非戰鬥員中間去注意，這樣整頓軍隊才可以整頓好。如同掃地一樣，一定要從房子四角掃起，不要在地中間掃掃就算完了。整頓軍隊也是這個道理，一定要從軍佐役，如經理、軍需、看護、火夫、勤務兵，甚至在一切馬夫挑夫等夫役上整頓起來，然後再來整頓其他員兵，必須這樣，才可以整頓得好。

以上所講的，大家不要以為是無關大體，不值得注意的事情；要知道灑掃應對，穿衣吃飯的小節，無事不與軍紀風紀息息相通。中國人完全講表面，不講實在，講空話，不講實行，所以一切沒有精神，所以國家弄不好。我們要雪恥，要復仇，要救國，就要腳踏實地，從精神上，實際上，內容上做起。現在一般辦事人同主管長官，最大的毛病，就是祇做表面的工作，上層的工作，不能貫注到下層去，尤其不能貫注到身心去——「致良知」的工夫，實在是大家應該省悟為目前救國最重要的工作。

我們從前在學校裏，先生教我們祇知操課，祇知立正，開步走，射擊，祇知道在講堂裏

典範令，從來沒有人教過我們將來出去一定要注意司務長、勤務兵、火夫、馬夫，或是從灑掃應對，衣食住行，身上很小的地方去注意做人，所以今天特提出來對我們一般學生和官長講解這「致良知」的道理，我祇是從很粗淺的地方說起，但作事就要從粗淺的地方做起，不從粗淺做起，就是不徹底，就是沒有根本。一般學生如果要做一個愛國者，做一個革命軍人，一定不要學祇講表面形式，和一些好高騖遠的習氣；這種習氣，完全是害己的。譬如掃地一定要從四角掃起，然後掃到中間。練軍隊，也一定要先從勤務兵、火夫、馬夫、衛生隊馬匹練起，以至練到他的身心，這種教育，旁的學校，旁的教師，是沒有講過的。我相信惟有我才能夠注意於此，傳授於各學生。如果我們軍隊不從這下層乃至從身心上注意起，那末，軍隊就永遠不能建立的，國家也永遠不會強盛，終久要給日本滅亡的。總之我們要雪恥，要救國，須要從根本上做起，從小而粗淺的容易的地方做起，雪恥與救國并不是難事，祇看我們有沒有這自強自立的從身心做起的決心。

## 第五節 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

### 道的精神

△日本立國的精神是武士道而武士道又是中國儒教殘餘的東西。我們自己固有的民族精神不知保持所以國家弄得如此地步。日本已踏上窮途末路。我們只要奉行三民主義就能保全國家並可做世界和平之主。我們要復興固有的民族精神方能抵抗日本武士道。

戴季陶先生上週講演的民生哲學系統與孫文主義哲學基礎，是對於總理遺教，最有體系的說明。這本哲學基礎的書，便是戴先生著的。這個民生哲學系統表，也是他自己立出來的。要講解的講個明白，那一點鐘的時間當然不夠，所以上星期僅講到倫理方面，還沒講到政治方面，至於政治方面，若照這個系統表講下去的話，那就要講整個的三民主義了。三民主義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精神的表現，非有更長的時間，不能講下去。我們要知道，孫

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可以說是三民主義最中心，最基本的一個基礎。我們現在有很多關於黨義的書籍，總理也有很多的遺教遺訓，雖然不能夠全部的給他一句句背出來，但無論那一種學問，歸納起來，一定可以「博學約思」，成功一個簡要的系统，可以隨時供給人人體察的。民生哲學系統表，就是從博大的三民主義中，把它約而精之，成爲一個簡明的系統，這個表是很要緊的，我們不要忘了。祇要看過這表的大綱節目的人，大概就知道是不會錯的，而且無論政治方面，倫理方面，從總理起至於幾千幾萬年後，亦不能離開這個道理的。我相信古今最完美的哲學，莫過於此，所以要大家格外的努力研究與實行。

本來我上星期就要動身到漢口去，後來因爲有一點事情沒有辦完，尤其我答應在學校裏講日本的武士道，還沒有講過，所以我特爲延期到星期一講演以後，才起程赴漢。

日本武士道的大略，已載在黨軍日報，和軍事雜誌上，你們大概總看過了。「武士道」歷史，雖然是在我們宋代——即日本源賴朝的時候就有的，但是到了德川幕府之後，明治維新的時候，却格外的興盛風行，他們是拿了武士道來提倡日本的民族精神，造成了他們的「大和魂」——日本民族的靈魂。所以武士道就是他們國家民族的精神，你們看過這篇文章，一定感覺到它是很散漫的，沒有像我們的民生哲學的有系統，可以具體的立成一個系統表出

來的。若是拿日本的武士道到中國來應用，更是完全用不着的。我今天所講的話，并不是說我們要學日本武士道，來復興中國，但是我們要立國，要抵抗敵人，就先要認識敵人的精神和他們立國的基本。所以我們要抵抗敵人，不僅在乎槍砲軍械要比敵人一樣精良，而且必先要澈底明瞭敵人的立國精神所在，要攻到敵人的心坎裏去，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就是這個道理。總理常常引用孫子「攻心爲上」一句話的意思，也就是這個道理。我們要攻敵國，一定要先攻他的心，僅是得到他的城池，捕獲他的俘虜，都沒有用。無論那一個人都要記住這句「攻心爲上」的格言，尤其要知道日本侵略中國的精神在什麼地方，這是比研究甚麼戰術兵器都重要。我們今天講日本的武士道，就是講他立國的民族精神，我們現在要抵抗日本，戰勝日本，消雪國恥，報復國仇，先決條件就是要能夠攻到他的心裏頭去。如要攻他的心，就先要研究他的心之所在，更要研究他的心的內容，也就是要研究他的民族精神寄託在什麼地方，今天所講，日本民族精神寄託的所在，就是武士道，武士道發生時期已是很久，但它的發揚，却在德川幕府時代，而昌盛於明治維新以後。在我們中國人看起來，這完全是封建遺物，不過是養成人們封建思想的東西，決不能造成一個現代新的民族國家的精神；我們並不承認武士道可以拿到中國來做一個立國的精神，我們中國自有中國建國的精神，用

不着去模倣人家，更用不着去學日本從我國儒道之餘唾所竊去的武士道。可是我們要知道，他的武士道是從何處產生出來的，武士道的發源，起因，又從那裏來？這些，我們一定要弄個明白，他爲什麼叫武士道，爲什麼士道上面加一個武字？因爲從前日本原是學我們中國的儒道，所以只有「士道」兩個字，後來因爲他國內一般藩閥武人，儘量拿了他的武力，去做他割據分爭害國殃民之事，把他們從前在中國學去的之所謂「士道」，就是讀書人的道理，都不講求，所以才於「士道」之外，有一個武士道，因此於士道之上，特加一個「武」字，表明一般武人亦要統統懂得「士道」。武士道這名詞的發生，就是他們恐怕武人不懂道理，所以特別提倡說：不僅是文人要知道這士道，而武人更要知道，所以叫做「武士道」。簡單說，日本人之所謂士道，就是中國的儒教兩個字：士就是講儒，道就是講教，士道就是一個儒教。所以我們曉得，武士道乃是儒教中殘餘的東西，片斷的被日本截取了去，做他們霸道立國的民族精神。儒道本來是整個的我們中國王道的民族精神，却被日本人片斷的拿去做他們的霸道的民族精神，而我們自己有民族整個精神所在的地方，我們自己却毫不注意，人家只把我們儒道殘餘的東西拿了去，就可以當做寶貝，成爲立國精神，到今天居然用這個精神來侵略我們中國，割台灣、滅琉球、併朝鮮，侵佔我們的東三省，真是使人痛心之至。

上面是說明武士道的來源，大家可以知道，武士道的道理，不過是這樣的一個東西，沒有甚麼稀奇，也不是他們日本人固有的寶貝，而是中國的舊貨被他偷得去，成了他們的民族精神，居然敢用來侵略我們中國，而我們中國自己固有的東西，反自己來拋棄不要，給人家偷去，讓人家用它來壓迫我們，你看可慘不可慘、可恥不可恥，我們簡單的講，現在國家到這樣衰弱的程度，社會，經濟到了這種破產的地位，人心到了這麼麻木不仁的時候，這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自己把固有的美德，很完備的立國治國的精神，很好的主義，統統都拋棄不要，只會今天東拿一點，明天西扯一點，不僅忘了自己固有的立國精神，而且忘了他自己是一個人，更忘了他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所以弄得我們固有的民族道德精神，喪失得一絲不留。如果一個人沒有精神，雖然活着，也如同死了一樣；國家失了他的靈魂——精神，名義上雖然存在，實質上也是同亡了的一樣。現在社會破產，人心麻木，紀律盪然，秩序紛亂，毫無廉恥，不講信義，這原因在什麼地方，完全是因為我們的立國精神死了，如果我們再不想法子挽救，復興我們的民族精神，那末滅亡就在目前。

所以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民族精神之重要如此，民族精神失了，國家就有若無，存若亡。如果有了這民族精神，即使國家滅亡，也可以復興起來，所以我們不怕日

本人怎樣侵略，而只怕我們自己沒有民族精神。

我前幾星期講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就是被日本人拿去做了他的武士道的精神，武士道的內容，沒有旁的，簡單說，明治維新以前，德川幕府時代，他們就拿中國程朱與陸王等學說來研究，有些人是講程朱之學，有些人士是講陸王之學，結果就對於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有了所得，就是說士道不僅是知，還是要來行，他們得了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學說，做他們的立國精神，他們就拿這個動的哲學要來侵略別人的國家最初的第一步就是提倡征韓論，這就是王陽明政治哲學的唾餘，竟造成功日本為侵略的民族。實在說，王陽明哲學是非常之有價值的，他在儒教中間，真是別開一個生面，他因為當時中國民族麻木、消沉、散漫、萎靡，只講文學、文教，儘是講，而不去行，這實在是亡國滅種的現象。他目擊當時中國人的民族思想那樣衰弱，精神那樣消沉，頹唐，將來一定要崩潰滅亡。他知道當時之所謂儒教，只注重靜的一方面，而不能提倡動的哲學，僅僅向靜的方面發展，大家伏在桌子，上翻死書本，而且互相標榜，弄得門戶之見，非常之深。所以到了明朝危亡，滿清已侵入關內的時候，而一般儒者，還有很多黨派的對立，互不相讓，這樣讀書人，讀了幾句死書，只會空談理學，弄得自相殘殺，而對於敵國外患怎麼樣抵抗，民族精神怎麼樣復興，却一些不

間，王陽明的眼光，當然超過他同時代的一切讀書人，他雖未到明末時代，但他早已看見中國民族將來不得了，一定會給外族來侵略，所以他到後來專提倡動的哲學，而批評靜的哲學。但是中國的陳腐哲學，積重難反，王陽明的哲學仍舊不能風行到底，反被日本人看見，倒拿了王陽明「致良知」「知行合一」哲學的片段，馬上實行起來，到現在成功一個侵略民族，可以說日本民族之有今天，完全是從王陽明哲學片段中所得的教訓。也可以說，他們是採取了中國儒教中片段的一段，纔變成功了一個侵略的民族，我們中國是怎樣，如果把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同我們總理知難行易的哲學，成立一個立國的精神，是不是會變成一個侵略民族？我相信中國人若是拿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固有的民族道德，以陽明「知行合一」動的精神，再加上總理「知難行易」行的哲學來闡明，融會貫通為一種新的民族精神，我相信中國一定不會做侵略的民族，他一定是一個世界上的和平之主。而同時也至少可以保障我們國家、民族，不會給人家侵略。日本怎麼會成功一個侵略民族？因為日本沒有我們中國固有的國民性，他僅在智仁勇的勇字方面努力，而中國儒教整個的精神道德，所謂信義和平的要素，完全不講，所以他只知道勇，而且只知道血氣之勇，而不知道禮義之勇，所以他雖學得了陽明動的哲學一片段，而其結果，充他的量，還是亂動盲動，陷入了一個動的大毛病。

所以他就成了一個侵略民族了。中國民族性現在仍站在靜的方面，無論倫理、政治，自秦漢以來的哲學思想，直到現在為止，儘是講究靜的。所以民族精神，就如此其積弱不振了。如果現在我們把道德方面的精神爲基礎，而再在動的方面盡量的發揮，這樣子，就可造成我們固有整個的民族精神。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基礎，是整個的，我們可以看明白，王陽明以前的儒者，大都是求諸靜的方面，而撇開了動的方面。不然，如果是動的行的時候，知行並重，那麼王陽明也不會發明這「知行合一」的哲學了。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的哲學之後，當時雖能風行一時，但到他死後，雖有他的幾個學生，傳受他的學說，可惜他們沒有他這樣大的魄力與精研深造，所以到後來不久，他們的精神仍舊侷限於靜的方面，而動的方面却完全振奮不起來。及到滿清入關，我們中國民族被滿清統治了二百多年，也就是由於王學未能充分發揚的原故。總理看過王陽明的哲學，認爲是中國存亡的大關鍵。但是單靠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還不能喚醒我們中國民族的儒教迂腐之氣，所以他講得更加明顯，要我們中國人在行的方面進行，「知難行易」就是獎勵我們中國人竭力去做，不要伏在桌上讀死書嚼虛文，我們中國人如果能夠應用從前中國固有的良好哲學，服膺 總理的學說，發揚光大起來，那末，我們一定可以做一個和平的柱石，而且決不會成功侵略的民族。

上面這一段，是講日本成功今天這樣的一個侵略民族，是因為只行王學一部分片段的哲學，可惜他只把中國一部分的哲學抄襲去了，而沒有把中國全部分的哲學精神拿得去，所以他現在成功一個侵略的民族。日本這樣的民族，他只曉得用武力侵略人家，而不顧國際道義。這樣的一個侵略民族，他在世界上，一定不能存在，不會有救的。所以我們今天要打破日本的侵略民族，而要保護我們自己民族和領土主權，可用什麼方法纔能成功呢？這種立國自衛的精神，決不單是拿武器可以造成的，日本今天要消滅我們國家，滅亡我們民族，他只是拿了幾百萬陸軍和幾十萬噸海軍，我們並不怕他的，須知我們中國有我們中國立國的精神，幾千年來都不能拿武力來消滅的。所以我們要復興我們固有的民族精神，方能打破日本的民族——「武士道」；打破他拾着我們中國殘餘的哲學。我們講習的兵器戰術，統統是很重要的，但還要知道，打破日本侵略的民族，在武器戰術外還有最重要的一個「攻心爲上」的要素，用來攻破他的精神，道除了應用我們中國自己的固有民族道德外，是再無他法可取勝利，如果能夠拿我們中國固有的民族精神，連繫起來，振作起來，當然我們可抵抗日本，可以抑制日本侵略的野心。

你們一般軍人同志，今天聽了這一段話，要知道我們自己的民族，的確是文明的，而且

是有幾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我們的毛病是在什麼地方？就是只在靜的方面消磨，而缺少動的方面的振奮。所以要補足我們的缺點，就要拿我們「知難行易」的哲學，在行的方面提倡起來，這樣子，我們把「知行合一」「知難行易」的哲學，來打破日本殘缺不斷的哲學；我們先要打破他這種精神，纔可以消滅他的野心，這就是攻擊日本，抵抗日本，最緊要的一個武器，這纔是真正的武器。我們立國保種的武器，是在知難行易，我們要消滅日本的野心也是在這個武器——知難行易。所以我們要注意 總理哲學基礎，是有這樣的重要，什麼兵器，戰術，都沒有這樣重要。

但是我們儘是知道，儘是研究，這與事實不相干，我們知道了一定要實行，要去做，如果知道了不去做，我們有還很好的可以打破日本的武器，而我們自己却不去行，那末，光是知道，拿從前「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的道理，因循自誤，那就仍陷從前知易行難的覆轍，而中國國家民族的麻木，衰弱，決不容易挽救。我們怎麼樣纔能夠打破日本的侵略思想，就是要先能夠打擊他的精神——心。拿什麼東西，纔能夠打擊他們的心？這就只有拿我們「知難行易」的精神，纔可以打擊他們的侵略精神。實現 總理的三民主義，纔可以打倒他們侵略的帝國主義。怎樣能實行我們的主義？這是要應用上星期所講的民生主義基礎裏的智仁

勇，這是我們中國最具體的一個整個的民族精神，亦是一個整個的立國精神。所以我們不僅是要勇，而且要智，更是要仁。這智仁勇之表現，只在於行，所以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就先要實行我們「知難行易」的哲學。

從前古人所講的格致，就是現在的研究科學，我們要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就是要研究科學，如何能夠格致以至於治平，第一就是要修身，如果自己不能修身，一定不能致知；不能致知，也就一定不能革命的。所以大學上面所講「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未之有也」。如此可知從格物致知到治國平天下，就是要以修身爲本，你能修身，就是治國平天下的基礎，也就是致知格物的基礎。你不能修身，決不能治國平天下，也決不能致知格物。所以我們要打破日本，消滅日本，抵抗日本的侵略野心，只有先恢復我們自己民族精神。這樣就要先在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中一個最緊要道理——修身去做去。如果自己不能修身，對於黨國不忠實，對於上官不精誠，對於部下不親愛，這樣的人，僅是想自私自利，就是不能修身的人；這樣的人，是絕對不能革命治國。所以大學裏讲政治哲學基礎，講到後來，只要修身，修就是行，修身就是由本身做起，無論何事，必要由自己個人起，方能普及於同志，普及於部下，然後才能普及到全社會全世界。但是我們要從修身做到治國平天下完成革命

。用什麼方法纔能做到？這就要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要提倡立國精神，要恢復固有的民族性，中國現在立國的精神和中心思想，就是三民主義。所以中國唯一的中心思想，不能確立普及，即三民主義不能實行，民族性不能復興，那是中華民族不會有救的。反轉來說，要救中華民族，只有實行三民主義，復興中國民族性，確立中國的中心思想，乃是今日救國的唯一藥方。三民主義實行的基點，從什麼地方做起？三民主義實行的基點，就是「知難行易」，我們就是要實實在在去做。去做什麼？要去修身，要由我們自己個人本身做起來，例如從我們本身做起來，個個人能夠向上，愛國，個個人能夠知道廉恥，知道禮義，到這時候，當然國家會有秩序，政治會上軌道；如此，國家當然能夠做成功現時代的新國家，然後能夠爭生存於現代的世界。

我們如果身不能修，無論怎樣叫，怎樣喊，雖有怎樣大的本事，也絕對不能抵抗日本；我們要抵抗日本，要保存我們自己國家，唯一要緊的條件，不僅在於武器戰術，而在我們自己能夠信奉中心思想，個個人能夠實行。總理的三民主義，普及「知難行易」的哲學，復興中國固有的民族性，纔可以救國救民，纔可以抵抗日本，纔能洗滌我們的恥辱。

所以無論是智，是仁，是勇，總是要實行，而尤其是智的內容，在民生哲學基礎系統表

裏，更是要篤行——即是要篤實去做，不要假裝着去欺人。所以我們要救國，就要篤篤實實去做救國的事情，不要只講面子上的工夫。

篤行是什麼？怎樣能夠篤行？這在智仁勇上面，就是一個誠字。怎樣去篤行？篤行就是我們知道三民主義是好的，是可以救國，無論如何，死心踏地，任何犧牲任何痛苦任何危險都不顧，我們只是實實在在去實行 總理的三民主義，這樣才能夠說是篤行，才能夠叫做誠。

現在歸結起來，我拿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和他的毛病，再講一遍：

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剛才已經講了，我再拿智仁勇三字來演繹，即可知道日本的武士道的精神僅在於勇，最多帶上一點智。我們中國古人所謂勇的解說，有義禮之勇，與血氣之勇之別，而於我們中國智仁勇三個字中最緊要的仁字，日本却絕對沒有。他不講信義、仁愛、和平，完全祇講侵略，強暴，所以日本武士道只講忠勇；而他的精神，亦完全是提倡血氣之勇，而中國儒道所最緊要的仁愛的仁字，與所謂義禮之勇的勇字，他完全不講。這樣子，我們相信日本現在這侵略民族的程度，已經到了極點，他沒有這個仁字，補助這個勇字，他國家民族一定是不能存在的。所以我們不怕日本的武器、武力，我們對日本的缺點優點，統統

看得出來，日本現在已經做了全世界衆矢之的，他的立國精神的基礎，完全只注重在血氣之勇，而毫無信義仁愛的精神。所以我們要保持民族精神，一定要將智仁勇整個的民族性完全具備，國家民族才可永立於世界上沒有危險。如果我們僅是講勇，而不知道智與仁，如日本一樣，那就危險到萬分。所以要知道，我們中國民族性的內容，就是智仁勇整個而具體的一個固有的民族精神；如果能夠實實在在篤行的時候，我們相信，國家不僅可以保持永久，而且一定能夠發揚光大，絕對不會做日本式的侵略的民族，而且可以做世界和平的柱石。但是這件事情，是要我們中華民族個人知道這個道理，個個人能夠實行這個主義，才能達到這目的。我們怎樣才可以使得個個人能夠實行這道理呢？沒有別的，無論那一個國家，怎麼大的民族，不是說個個人皆可懂得這個道理，亦並不是說個個人都能督率人家革命，一定要由我們少數人做起，就是 總理講的，由先知先覺的人，先提倡起來，我們縱不能做先知先覺，至少要做一個後知後覺，我今天所講的，和這幾星期來所講的話，如果完全能夠實行，就不愧做一個 總理的信徒——後知後覺者，只要由我們後知後覺的少數人，能夠首先實行這個道理，不久自然有許多人跟着來，乃至於全國風從，統統可以跟到我們來革命，實行我們的主義。所以我們不怕全國人不懂，也不怕全國人不做，只怕我們自己不能實行，不能從本

身做起。我們必須全國人人都懂，他們不懂，我們也不去苛責他們，只要我們自己最少數的人能夠切實的先去做起來。所以我們要做人，要做一個國民，要做一個革命黨員，自己就要首先復興我們中國固有的民族性，就是實行我們的三民主義，實行我們的主義，首先要實現

總理的知難行易的哲學。總理已拿所有的知告訴我們了，我們現在就是要實實在在去行就罷了。我們不必儘是去求知現在只要來行，我們的教習，官長對於學生部下，應該怎樣的誠懇，怎樣的敬愛，才可以實踐我們知難行易的哲學。怎樣才能復興我們中國固有的民族性，怎樣才能做我們 總理的革命的信徒，來做真正的一個革命黨員，我們自己的同學同事的人，用怎麼樣一種修身的工夫，才可以使得一般同學信仰，樹立這革命的風氣，使得我們少數人的精神能夠先團結起來，來造成成功革命的集團，然後使得一般國民統統都跟隨着我們實行主義，完成革命，這個責任，完全是我們少數後知後覺的人，應該切切實實負起來的。如果我們不擔負這個責任，就永沒有人擔負這個責任，將來亡國滅種的罪惡就應該由我們負責了。爲什麼呢？我們身爲革命黨員，而且明明白白曉得這個道理，而不能去做，這樣應該由我們負亡國的責任。所以一切懶惰，麻木、腐敗、頹唐、驕傲、奢侈、不能耐勞，不守紀律，不從法令，沒有廉恥，不知禮義等等毛病，應該切實除去，而來力行我們主義，復興我們

民族固有的精神。今天拿日本武士道弱點和優點，同我們總理三民主義，以及我們中國立國精神和固有的民族性，來比較研究，我們現在慢說拿武器武力同日本比較，我們務先要拿自己的民族性同日本來比較。諸位應該知道：這鐵製的武器的精進，不是一天可以造成功的，而我們立國的精神，我們的民族性，乃是固有，內在的，如果我們要恢復，馬上就可以恢復，不要用甚麼工廠，和別的經費技師來製造的。所以我們要打倒日本侵略的野心，要打倒日本侵略的武力，先得打倒他日本的侵略精神，要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先要完成自己應該具備的革命精神——固有的民族精神。我們的革命精神，就是智仁勇，而其基礎就是修身，要我們本身先做起來，先實行我們的主義，先求本身不腐敗，不驕傲，不懶惰，先要本身知廉恥知禮義，如此，才能挽回革命的頹風，才能振起我們中國民族的革命精神。我們總理所提倡恢復中國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美德，日本武士道裏最多只講忠勇兩字，即使他亦有提到信義的時候，但是他的精神只在於勇，而絕無仁的意義，所以這種國家民族，沒有不滅亡的。我們中國立國五千年來，無論那一個國家來侵略我們，總是被我們同化、消滅，這是什麼道理呢？完全是由於我們中國民族哲學文化的高深偉大，超過了一切侵略我們的民族的緣故。但是我們民族現在的確到了極危險的時候了，爲什麼？因爲現在我們一般國民

，皆麻木不仁，自私自利，以致人慾橫流，所謂固有的國民性，立國的精神喪失殆盡，加以現在科學發達，帝國主義者，用科學方法，來滅別人的國家。那國家就決不能夠倖存，這都是民族滅亡的最大危機。所以我們要成功一個革命者，要成功一番革命大專業，要做一個革命信徒，就先要由我們少數人自己學做一個完人來風行全國，來做全國民的領導者，這樣才可以完成我們革命的使命。所以我們沒有精良的槍砲，及不了日本人，是還在其次，而最重要的，還是要復興中國固有的民族性——智仁勇三字整個的民族精神，非迅速的恢復轉來不可。所以我們先要修身、力行，提倡我們總理知難行易的革命哲學。

現在唯物論者，僅是講「唯物」，完全排除了精神方面，這在東方民族一定是立不住的，就是西方的民族也不能離開了精神而獨講物質所能立住的。我們中國從前，僅是講唯心，而不注重物質，所以不能夠獨立，不能夠發展，我們要成一個新時代的國家，精神與物質，決不能偏廢的。我們只知道「知難行易」的「行」字，為唯一的人生哲學，而不能承認唯心哲學，亦不能承認唯物哲學，而我們所以只知道有一「行」的哲學；所以我們要抵抗日本，消滅敵人，一定要在實行，一定要拿固有的民族性和智仁勇的民族精神，整個的實行起來，我們革命才能完成，國家才能發展。這樣子才是全部的、整個的、真正的三民主義者，亦就

是實行我們 總理知難行易哲學的信徒。

希望你們一般官長，學生拿今天所講的，和前幾星期所講的話細心研究。要知道，我們要打破日本，洧雪國恥，不僅是靠武器武力，我們先將久已失傳的最要緊的民族性恢復轉來，才可以抵抗日本，才可以保全民族。所以「攻心爲上」，我們抵抗日本，先要攻擊日本的侵略精神，如要攻擊日本的侵略精神，就是先要具備我們已有的立國精神；自己立國精神不具備，想去打破人家，這事情是不會成功的！今天我講的和上星期戴院長所講的話，拿日本武士道和我們中國三民主義比較，現在概括起來講，我們中國的立國精神，是在三民主義，日本的立國精神，是在武士道。武士道從我們中國儒教哲學中間所偷去的一部份東西，我們要打破日本，先要打破他的武士道；要打破他的武士道，唯有拿我們三民主義，才可以打破他。我們不怕日本武力強橫，而只怕我們自己立國的精神喪失，民族性消沉，所以我們先要恢復我們自己立國精神，才可以挽救危亡，洧雪恥辱，抵抗日本，完成革命的事業。

——二十一年六月六日講——

## 第六節 政治的哲學

一、大學中庸與禮運爲中國政治哲學寶典，而中庸哀公問政一章尤爲治政的原理。

二、分段闡明哀公問政章的內容要義：

1, 政治要以人爲本，要以修養人格和推己及人爲推行的根本。

2, 政論應該由個人對家庭社會和國家完滿負責做起，應篤行五達道與三達德，而以

「誠」字貫澈到底！

3, 說明修養人格的重要和效果，勉人努力自強，勿自暴棄。

4, 列舉九經的功用和要義，說明爲政之道，在乎由內及外，使天下人由親及疏，各得其所，以達和平安樂之治。

5, 一切事業開始以前須有預備，而原理原則，尤爲一切行動的前提。

6, 政治原動力在乎「誠」，而完成「誠」之德性，在乎力學與篤行。

三、本章要義之總提示，與「誠」爲成己成物之詮釋。

四、中國政治哲學的簡義：

1, 政治的理想和目的在提高「人」的品格，發揮「人」的價值和功用，修明「人」與「人」的關係，爲政在人，一切以人爲本。

2, 政治哲學與倫理哲學相合一——政治以倫理爲基礎。

3, 禮運篇爲「地方自治」之圭臬。

4, 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目的在使人盡其才，各得其所，各遂其生。

5, 中國政治哲學以行「仁政」爲本，故特別注重疾病、痛苦、困窮、的救濟。

五、希望大家究明政治哲學的簡義，認清實際政治的本務，共同一致，篤信力行，來實

現三民主義，完成建國使命！

各位同志：

今天要將我個人研究中國政治哲學所得的幾個要義，貢獻給各位。因爲各位都是担任推行三民主義的幹部，每一個人都是要管理幾十幾百乃至幾千人，而且要感化到幾百幾千乃至於幾千萬人，不可不明白政治是什麼？我們政治的目的是什麼？我們的入手方法又是什麼？

我們總理生前常常稱道我國古時的政治哲學，曾說「論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恐怕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總理最推崇的是大學中庸和禮運。總理在三民主義和軍人精神教育中，屢次提到大學之道和禮運的大同之治，至於中庸的道理，似乎沒有多所發揮，但是軍人精神教育講演中所說的知仁勇，與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的道理，又說是非之別，就是合乎道和不合乎道，再則於分別說明知仁勇三者以後，又特別詳述「決心」的一章，這些遺教，都是由中庸一書而來的，中庸第一章在中國政治哲學上的價值及其地位之重要，我從前已經在聯軍大學裏講過了（現在已有專本）。今日再要將他第二十章即哀公問政一章，特別提出來講解一下，這實在是我們同志尤其是擔任各級幹部的同志，更不可不熟讀精思的一部治國行政，革命做事的要則。我們把這一章書裏面所講的各點，拿來和大學與禮運相會通，就可以明瞭我國政治哲學的真諦了。

爲着說明的方便，我要首先講明哀公問政章的內容精義，但是有兩點不可不首先注意的：（一）這是孔子答魯哀公的話，哀公是一國的君主，所以孔子所答的，中間有很多話，是以一個君主作主體；（二）孔子時代有那時代的環境，中間列舉節目，或者有和現代不盡相合的，我們要體會他的精意大義所在，不必拘泥於每一句一字，這纔叫讀書能得其用，纔不

會以文書意。

本來這一章書，篇幅相當的長，層次章節，也不容易劃分得很清楚，我現在列舉他主要的內容，其餘所沒有列舉的，各位要知道那些祇是說明的部分，可以拿來參讀的。他的主要內容，可分為下列的幾節：

(一)是說明政治要以人爲本，要有人來運用，要合乎人類的本性，要修養人格和推己及人爲推行的根本。這就是原文所說：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注意：這裏所謂人，並不是指個人，乃是指多數人，必須有明瞭這個政制的原理和價值的人，然後良好的政制纔有人來運用，纔有人來實行，不然就像我們敵國——日本一樣，明治時代僉立了的一些政治的規模，後來風氣一變，一般暴亂軍人蔑視成規，就可以壞法亂紀，使政治改形變質，釀成禍亂。「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蒲蘆，是最易滋長之物，政治如果不違反人類的本性，就像植物得到養料一樣，必能推行無阻，而且成長得格外迅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這四句是主意，自始至終都注重在人，所謂「仁」亦只是人道人性，換一句話說，就是人對人的關係，和

人與人間共同的理性，以此修道，以此修身，再以修明的人格，影響他人，吸引他人，政治就可推進。其次乃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這一節就是說無論仁與義，無論親親與尊賢，皆應行施得當，毋使有過與不及之處，故一切行政，皆要折中於禮，而且要以禮來節制。這個禮，在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我屢已詳言，今不贅述，不過這個禮字的意義，在本章裏所說「從容中道」一句話，格外可以解釋得透澈了，各位因此更可知道禮的意義與重要了。總之，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政治者的行動態度皆要合乎禮，就是合乎宜。否則就有過與不及，如此，就要亂了，就不成其爲政治了。

(二)是說明政治應該由各個人對家庭，社會和國家完滿負責做起，說明所謂五達道和三達德，原文說：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所謂達道是指人人所應該履行的大道，不論地域職業有所不同，沒有一個人可以例外。所謂君臣關係，在那時自然只知道是臣子對君王個人的關係，但其實就是國民對國家的關係，而在現在的解說，更可推而廣之，因爲現在是民國，自然以

民爲主，亦就是以民爲君，不過從前所謂忠於君者，只是忠於個人，而現在是要忠於衆人了。從前所謂忠者，只是忠於人，現在還要終於事了。所以在政府裏爲國家和人民服務的上下官吏，就是一切公務人員，都要以臣僕自居，盡忠於民，盡忠於職，而我們國民亦要人人以中國的主人自居，但是做國家主人的人民，亦必要對他自己的國家和職務，更要負責盡忠。至於父子，夫婦，昆弟是個人對家庭的關係，朋友之道，推而廣之就是個人對社會，對團體的關係。「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不論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要盡到責任，就必須要有良知，（智）良能，（仁）和決心（勇），不然就祇會倚賴而沒有貢獻，祇知侵奪剝削而不知服務了，上面說的達道，是說對人的關係，知仁勇三達德，乃是盡己的本務，所以行之者一，就是說不論求知行仁尚勇，都要貫徹到底，所謂「行」者，就是成已成物的「誠」字。

（三）是說明修養人格的重要和效果，要大家努力自強，不自暴棄，乃必有成。原文說：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這是說人類資性有高下，環境有難易，聞道有先後，祇要鑽而不舍，最後個人必能同樣地達到終點。「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這是

說知仁勇是人格的標準，好學，力行，知恥，是修養的入手方法，「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這是與修齊治平的道理相互發明，我們本生認清楚個人在家庭社會和國家中的責任，把握住三達德來修身，必先自己能夠修養完滿，而後才可以管理直屬的部下，這樣管理才能生效，這樣做事，才能有成，這樣才可以對國家對世界有所貢獻。

（四）是說明為政之常道在乎由內及外，使天下人從最親近到最疏遠的都能各得其所，來達到政治的目的，就是所謂「九經」，這是和現代的情形有多少不同的，但項目雖應該變通，而原理還是一樣，原文首先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列舉其項目，其次說明九經的功用，再次說明如何實現九經的條件，各位要參看原文，細心體察，善為活用，現在照原文列一個表如下：

（九經的項目）

（方法）

（效果）

一、修身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

道立

二、尊賢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

不惑

三、親親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

歸父昆弟不怨

四、敬大臣

官委任使

不眩

五、體羣臣

忠信重祿

士之報禮重

六、子庶民

時使薄斂，

七、來百工

日省月試，既稟稱事，

八、柔遠人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

九、懷諸侯

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

這上面所說的「親親」。當然是孔子依照那時君主的环境，對一個國君說的話，但實際上在我國古代政治哲學，和修己治人的人生哲學中，沒有不注重個人對人，和人對家庭的義務的。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及「齊家而後治國」，都是一貫的道理，一個人如果他在家庭都不能負責任，盡義務，那對社會對國家，更不能希望他盡忠了。家與國的關係，正與國和世界的關係一樣，總理說「我們要提倡民族主義，……才可以講世界主義」，又說：「必先要鞏固民族主義，世界主義才能發達」。所以我們必要先實行民族主義，然後才配得上談世界主義。中國的政治哲學，就是由內及外層層開展，所以是很踏實的。我們現在是民國時代，「親親」二字的解釋，應該推廣開

來，不限於父子兄弟夫婦。尤其是革命黨員，我常常說要以黨爲家，這「親親」二字至少要做黨員和黨員的親親來解釋，便是親親的方法，也不是要「尊其位重其祿」，但是要竭誠扶助，使各得其所，各盡其分，就是要同甘苦，共榮辱，還是我們應守的道德標準，現在讀古書要會其意而活用之，這不過舉一個例子，我們必須明白這一個道理，才可以研究這一張表。再有幾點要特別提出的：第五項時謂「體羣臣」，就是我常常說的要與一般幹部和同志同甘苦共患難，不但恤其困乏，量他的工作而優給報酬，還要以忠信爲先，忠的意義包括恕字，推己及人謂之恕，信就是講信修睦，我們能推己及人，能講信修睦，就能使部屬同事踴躍盡力，這是第一點。第六目所謂「子庶民」，是要「時使薄斂」。所謂「時使」，就是要發動民衆，爲國家服務，但要不要其時，亦不妨礙他的生業，然後雖勞不怨，這是第二點。第七項「來百工」以下所謂「日省月試既稟稱事」，這在現在不僅是對於百工而已，我們對於部屬同事，都要規定工作計劃，督率進修，每日有每日的考核，一月有一月考核，看他們工作是不是合乎預定的進度，這一月較前一月有沒有進步，乃至年終考績，給以升降獎懲，都是這個意思。這就是要綜核名實的道理。至於「既稟稱事」的「既稟」二字，原文是「饋稟」，古時以穀代祿，看他的

工作，定他的俸祿或工資，要使報酬和工作相稱，不能使部下無功受祿，或工少而酬多，這樣就叫作「儉廩稱事」，這亦就是政治要賞罰嚴明的道理。第八項所謂「柔遠人」，在我們這個時代，就是對於邊地民族的同胞，我們要一視同仁，為他們開闢交通。使利往來，尊重他特有的習慣，使他們起居供給便利，如果文化程度上和內地有所差異，那麼我們對於他們的缺點，切不要菲薄他，譏評他，而對於他們中間比較進步的分子，更要特別的獎勵他，扶助他，這就是「嘉善而矜不能」。最後一項所謂「懷諸侯」，這一段更是我們中國古來最高尚最博大的政治理想，總理在民族主義講演中說「我們中國強盛的時候，從來不用經濟力去壓迫他族，從來不以武力去征服人家，中國的心理，向來不以打得為然」，這種和平共存的思想，就是淵源於這古來政治哲學。試看孔子這一段話，是對魯哀公說的，哀公也是諸侯之一，孔子對他說的，對於諸侯的義務，首先就說「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就是說，人家已被摧殘了的獨立主權，就要扶助他繼續起來，已經廢除了的國家民族，乃要扶助他恢復獨立，暴亂要替他平治，顛危要替他扶持，這就是我們國民革命援助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精神，我們決不乘人之危，反之，我們還要仗義尚俠，替別人謀幸福，我們一切要自給，並不取求於人，我們還要多所

貢獻於人，這就是所謂「厚往而薄來」，如果我們中國革命成功，總理的主義，普及於世界以後，國際上都以這種精神相處，豈不是和平安樂的大同世界？

(五)是說明一切事業開始以前需要有預備，也說明原理原則，是一切行動的前提，原文說：「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這裏所謂「一」，就是下文的誠字，九經是行的綱目，誠是行的原理。「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這是說一切事，都要事先有豫見，有豫定，有豫備，不論爲學，從政，作事，必須要豫想開始以後的情形，所以未開始以前，就要豫定種種的計劃步驟，來預備一切，如此乃能成功，反之就會失敗。「言前定則不跲」。跲即躓，所謂不躓就是站得住，說得通，行得開，不是信口亂說，隨便應付，「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凡做事必須有預定計劃，而後才免於後悔，「道前定則不窮」，這就是說如果先將原理確立了，然後對於各種不同的事項，以及各種可能的變化，皆能夠措置裕如，一切合乎機宜，不致窮於應付。

(六)是說明一切政治的原動力在乎「誠」，而完成「誠」之德性，要靠力學與篤行，這是總結全文，揭示一切政治人員修養的基本。原文說：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這是說天地間的現象，只是圓滿貫徹，永久不變

，人類要合乎天理，是全靠修行。「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古時所謂聖人，是完滿的人格之意，而並不是一種天生特別的奇才，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是說明誠的本能，應着上文「天之道也」而言，「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這是人人立業，以達乎理想標準的途徑，「擇善固執」是說我們從許多事理中，選擇出最完善最合理的成分，發現了以後，就要牢牢把定，不斷修習，以此爲一切行爲所發生的基準，無論如何困難，絕不放鬆，絕不拋棄，絕不中止，正像我們革命黨員對於三民主義，終身信奉服膺，至死不變一樣。「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這是修養學習的階段，「篤行之」，這是踐履篤實，力行貫徹的階段，「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這是說所知未廣，務求其博，一切學問，必要求其澈底明瞭，「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這是說要事事留心，事事虛心，當其未澈，問之必審，「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這是說有了學問，還要運用思想，學問求博求審，但思想則求其慎，因爲思想不能漫無軌道去求，不然就是馳騁空想，所以學問要博要審，而思維則以慎密爲主，「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這就是擇善的工夫，辨擇道理，方法和途徑的時候，必然要透澈內外，有得於心，洞明他整個的內容，然後才固執此

此法，安心奉行，「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篤與誠在意思上是連用的，篤行，就是貫徹始終，完滿達成的意思，亦就是我常常所說的「力行」「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與強即是誠的兩面，明是光明澈照，絕無滯礙，強是自強不息，貫徹到底。

以上是分段說明哀公問政章的內容，在這一章裏面，孔子把一切「爲政之要」都說明了。這中間提到爲政的原理，爲政的方法和步驟，爲政的先決條件，爲政的內容與項目，而最後提出一個「誠」字作爲政治的基本，看去似乎是錯落繁複，實際是很貫串的，他的主旨就是說爲政要以「人」爲對象，從作爲方面來說，若要得人，就要修己，知仁勇的修習，與學問思辨行的工夫，都是修己的內容，從主體方面說，要正己，（古人說政者正也，正己而後正人），也要納人於正，使各得其所，并且使各盡其力，而最後又貫以一個「誠」字，照應着通篇前後。這「誠」字實在是一切的骨幹，知仁勇德由此而生，九經由此而行，那麼究竟「誠」的內容是什麼呢？「誠」是修己治人的根本，一切事業的原動力，我們看後面第十二章所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可見得孔子這一章的主意，就是要說明爲政之本，在使人盡其性，不但要成己，還要能成物，此物字包括本身以外的一切人和事；

而成物之功，要從成已始，這不僅是對於一國君主的說法，實在對於一切負有管理教導訓練責任的主管人員，一篇極完滿的教科書，所以我希望大家對於這一章，要熟讀精忠，反覆研究，對於行政處世，作事做人，必有不少裨益。

明白了袁公閱政這一章的內容以後，我們再來與總理常常提到的大學之道，和禮運大同之治，以及其他古時論政治的學說相會通。我們就可以獲得下面幾個極精的要義：

第一，中國的政治哲學一切皆以「人」為本。大學之道所說的三綱，（一）明明德，（二）親民，（三）止於至善，都離不了人，明德是存乎人的本性之中，親民的對象是人，止於至善，即擇善固執，也要由人從學問思辨篤行中去把握，至於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八目，前四者是個人的修為，後四者是由個人而影響到更大範圍的人類分子，這八目也都是以「人」為本。再從禮運大同之治一章來說：開頭所謂講信修睦，是說人對人應有的關係，選賢與能的賢能是人，接着說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以至男有分，女有歸，這裏所謂親，所謂子，所謂老者，壯者，幼者，矜寡孤獨廢疾者，以及男的，女的，每一句每一項都指的是人，差不多離了人就沒有作為，離了人就無所謂政治，便是最後一段陳穀騰的經濟，但

是他不必慮於己，不必爲己，還是以人爲出發點，可以說整篇每一句都是以「人」爲對象。我們再來看中庸裏面所說的五達道，亦就是古時所說的五倫，其中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包括家族和政治關係以外的一切人）都是說明人與人的關係。再看所說的九經，所謂修「身」「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不歸」，德「的對象又無一不是「人」，因之我們可以說整個的中國政治理想，綜括一語以貫之，就是要把「人」的品格提高起來，把「人」的價值或功效發揮出來，把「人」和「人」的關係證明起來。中國政治的目的，爲政的精義，就是以「人」爲本，所以說「爲政在人」。

第二，中國政治哲學與倫理哲學相合一——政治以倫理爲基礎。本來所謂倫理照中國文字的本義說：「倫」就是「類」，「理」是紋理，引伸爲一切有條貫，有脈絡可尋的條理，是說明人與人的關係，這中間包括分子對羣體的關係，分子與分子間相互的關係，亦即是人與家庭，隣里，社會，國家和世界人類應該怎麼樣。闡明他各種關係上正當的態度，訴之於人的理性而定出行爲的標準。倫理與法制的不同，就是倫理是從人類本性上啟發人的自覺的，法制是代表國家公共權力而帶着強制性的，倫理不僅是指明某種行爲是正當的，而且從人性意義上去探求爲什麼這種行爲是正當的。法制祇是行爲的正當與不正當。不容許人們

適應其所當爲，或爲其所不當爲而已。所以倫理的教條，比較法制更難，更自然，亦更能深入於人心。在中國政治哲學上，很明顯可以看出大部分就是倫理哲學，從一個人的修身推而親親，再從親親而推到睦姻任卹，推到仁民愛物，甚至一切的制度和組織，也染上不少的倫理色彩，這是中國政治哲學的特點。我們在現在時代來看，因爲社會組織的不同，似乎覺得倫理觀念，或家族主義和現代不相合，但是祇要不將已失時代性的部分如九經裏面所講的，以尊其位，重其祿，爲親親的表現之類不瀾在制度裏面去，專就倫理來說，仍不能不承認中國政治哲學將一個人，由內發展到外，將一個人對於外在的關係，一步步的推廣開去，是層次最分明，而步驟最確實的，照我個人的見解，政治的條件雖然包含着軍事經濟文化的種種，但政治的基礎，實在是築在倫理上面，這樣才是最有根柢而最完善了。凡是人類，必有他與生俱來的天性，愛父母，愛家庭，以及對於自身關係的同族同國人的相愛相卹，推而至於愛人類，實在都是人的天性。無論如何否定道德和倫理價值的人，當他獨居深念的時候，或是當他疾病痛苦的時候，他的一線良知發現了，這種天性還是要完滿的表現出來。我國古來認定不能盡孝於父母的人，決不能作有益社會國家的事業，因此無論何人，皆不能相信他的「一聞寬行」，就是開政章所說的「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

朋友，不礙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顧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顧乎親有道，反諱身不誠，不顧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這就是說無責任觀念，而祇知自私自利的人，決為祇知自私自利的惡德，是多數人獲得共同生存和幸福的最大障礙，所以我說以倫理為基礎的政治理想，纔是最完善的政治理想。

第三，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目的在使人盡其才，各得其所，各遂其生，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體運一篇作重要的參考，中國的政治理想，是側重義務而不側重權利的，是主張服務和互助共濟的，是主張多所生產創造而少所消費的，是主張以能力強者的勞動，支持能力弱者的生存的，是濟重人與天然爭，而蔑視人與人爭的，總之是主張不侵奪的，安樂共存的。看體運上所說：「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這種博愛思想，已經夠明顯了。下面一段更重要。我們要注意他所謂「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就是說：對於能力已衰退的或未成長的，以及無依無靠而疾病痛苦的，要以公共的力量去供給他，養育他，扶持救濟他，但是對於壯者却不說有所是養，而說「壯有所用」，接着又說「男有分，女有歸」，可知對於一般能力壯健的，都要養成他們勞動服務，不論男女，都要使他們有所貢獻於生產，所謂「有所用」，就是要人盡其才，人盡其力，為自己的生存和公眾的福

利而服務。「貨不必藏於己」，但「惡其棄於地」，「力不必爲己」，但「惡其不出於身」。這兩個惡字，可見得那時的政理想，就以開發天然爲人生本務，以游惰和自私，爲衆所共棄的惡德，如果天然的資源不開發，不論是誰荒棄了的，却是人人共有的恥辱；如果有了力量，不爲公衆而使用，就要招受公衆的鄙棄！這真是天下爲公，協作互助的和平世界。人類最高尙最完滿的大同社會。我們看禮運一篇，自始至終不主張個人有「爲己」的權利，而祇有「盡己」的義務，還是「地方自治」的法則，亦是「地方自治」之圭臬。而「地方自治」的功効，就是對於社會上所有的人，必要使之有所終，使之有所長，使之有所養，而大多數的壯健分子，則要使之有所用，書經上說：「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這便是說「地方自治」的効用，不能使有一個男子或女子，沒有貢獻能力的機會，否則國家政治的目的，就算沒有達到。總之，我國政治的目的，是要使人人各盡其才，各得其所，各遂其生，這種政治理想，與中庸所說「九經」五達道「配合起來看，實在是仁至義盡，極平易，也極自然的理想，和歐洲國家以私人資本「佔有慾」來激刺生產，或是利用人類嫉忌爭奪的物欲，來強求「唯物史觀」和「社會革命」的方法相比較，真有天淵之別了。這種理想所由發生，以「天理」爲其思想之背景，所謂天理，祇是人人心中所同具的本性，所以樂記上

說：「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這一段話所描寫的景象，恰恰與禮運所說大同之治相反，因為悖天理，就有這種大亂的現象，所以修明教化，養成好風氣，使人人知道自求多福，唯有從勤勞互助，造成公共福利上去求。是我國古時政治哲學的固有的理想，我們要造成三民主義的政體，就必須有這種的覺悟和努力。

第四，是我國古時政治哲學特別注重於疾病痛苦困窮的救濟。古時所謂仁政，就是要發動人民的力量，救濟人民的痛苦，為政之要，就在於竭盡能力，定出方法和計劃，來救治人民的困乏與痛苦，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這是担負政治責任的人，應有的自覺。古時以矜寡孤獨四者為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聖四種人，有的是老而無依，有的是幼而無恃，古時候因為要養沒有一夫不獲其所，對這四人是首先關懷得很周到的，現在「地方自治」亦就是要特別注重此點，纔能說是真正的「地方自治」。可見養老育幼，是政治的要務，而政治的出發點，完全是在民生，至於病者，傷者，殘廢者，更是特別受到公家的救護，我們看上段所說，以「疾病不養」為大亂現象之一種，以及禮運所說「廢疾有所養」再證以周官所說「守望相助」以外，還要加上「疾病相

扶持」可見對於傷病殘廢的醫治療養，在古時是十分注重的，我們民族所以能夠綿延如此久遠，滋生如此衆多，不能不說是這個以仁爲本的人口政策之所賜。不但疾病殘廢而已，凡是無衣無食，失其所養的分子，都應該得到公家的周恤。書經上說：「先王子惠因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這是說所有因窮痛苦的人，都要拿父母愛護子女一樣的慈愛心理，去救濟他，維持他，纔是造成良好政治的起點。我們革命，目的在救國救人和救世，如果不能做到救濟疾病困窮最痛苦的同胞，一切的事業都是空的。

上面所說：把我們古時政治哲學的幾個要義，已經作一個大概的敘述。請位要知道政治的目的，本來不外乎解決人民的需要，近來研究政治的人，不是把政治看得太繁雜，太複雜了，就是把政治看得太狹小太空泛，而流於形式主義了。學者們有的探究政治的性質和起源，有的備叙各家政治的理論和學說，這種專門研究不是我們實際工作中所必需。至於那些不明白政治的全體，祇知道「行政」是政治，甚至以公文承轉，就當作政治的，更是離題萬里，而不切民生的需要。政治的定義，唯有我們總理所說「政就是衆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這一句話最簡括最明白。我們要知道政治的目的無非是滿足人類生存的要求。政治的精神就是總理所說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而以一個「誠」字

貫澈之：這個八德的精神，在這一章裏所說的「誠」字整個的表現出來了。講到政治的法則，乃全在於禮。並且要知道這「禮」與「誠」兩個字，是互相表裏的。所謂誠者，就是「誠於中」的道理。所謂禮者，就是誠之「形於外」的表現，故理之表現，必須出於誠，必須誠於中，這個禮，方是真正的禮，方能有效。否則就會流於虛偽的形式，或是繁文縟禮，就失了禮的真意了，至於政治的力量，則全在於篤行的「行」字。若說政治的極致，則不外使人各盡其力，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而政治的首要，還是在於得人。在使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和各種事業配合起來。而得人的先決條件，是要我們担负各級政治，尤其基層幹部的，先把自己修養成功完滿的人格，我們自身有了完滿的人格，纔能吸引已有能力的人才。訓練出各級勝任的人才，能夠踐履篤實的去行，這就是我所說的快幹，實幹，硬幹，苦幹的精神，把現行政治的效率增進了，把民衆的知識能力提高了，把政治的基層築得很確實了，而後我們纔能夠順利的推行我們三民主義的政治理想，和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來達成我們革命建國的目的。我希望我們同志切實記住政治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以人爲本。離却人生的政治，決不是爲全體人類謀幸福的政治。由此體會政理，瞭解我們自身的責任，確定我們實際工作的步驟，拿我們中國古來政治哲學已經闡明的精義，師其本意，勿拘泥其節目，與我們時

代環境和實際情形相比照，把他融會貫通起來，先之以修己治身，繼之以教化部屬，繼之以感應民衆，使屬於我本身職權以內的事務，秩然就理，而一切有當於人心，有裨於國計，最後，完成我們訓政時期應有的一切建設，這是我對於各級担負革命責任的幹部最大的希望，也是我講述自己研究我國政治的哲學所得的用意，諸位要知道我這篇講詞，並不是專家學者們想建立一種學說的著作，而是供給我們工作幹部，以一種實際的教材。所以諸位不但是要接受，而且要能研究，能力行。纔能切實受用，有裨於實際。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講——

## 第七節 行的哲學

一、行的哲學爲唯一的人生哲學。

二、過去所行不發生效果的原因，由於未認清力行的真諦，因而沒有信心，沒有耐心和決心。

三、「行」的本義是什麼？行就是人生。……要效法天行，自強不息。

四、行與動的區別……動並不就是行，動是臨時的，偶然的，他發的，行是經常的，必然的，自發的。……動有善有惡，行則無不善，……行是繼續不斷的，動是隨作隨止的。

五、真正的「行」是天地間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有目的，有軌道，有系統。

六、行的哲學無分於動靜，行是恆久的不輟的。宇宙皆爲行之範圍。

七、「行」爲「性」之養，與生俱來……人之生也爲行而生，我們亦要爲「生」而

行。

八、行的目的，在增進人類生活，羣衆生命，民族生存，國民生計。

九、「力行」就是革命。

十、革命的動機在救人，革命的本務在行仁。

十一、行的要素是「知仁勇」……行的精神就是真純專一，貫徹到底，處危若安，履

險如夷，這就是革命的精神。

十二、行的原動力是「誠」，行的表現在創造在進取，在建設，在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

，……行的極致就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十三、要應用科學的方法，注重「行」的四大要件：

1. 必須有起點……要找到着手之點，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不可越級開始，要

從基層做起。

2. 必須有順序，……定計劃，定步驟，認清時間環境與事件內容，在事先確實

準備。

3. 必須有目的，……朝着正大光明的目的與確定的目的做去，不達不止。

4、必須是經常的……革命力行只是平平實實的行為，用不着別出心裁的方法，與投機取巧的企圖。

十四、革命成功必須要有做無名英雄的志氣，冒險犯難視作平常，茹苦含辛，行所無事，尤其要不間斷，不中輟，立志有恆。

十五、篤信 總理行易知難的學說，從力行中去求得真知，……「能知必能行」與「不行不能知」的意義，……唯有篤行纔是力行，唯能力行纔無所謂難事。

十六、祇要我們立定決心，抱着熱誠，照着我們信仰去力行，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亦必容易達到我們革命的使命！

各位同志：

我在民國二十一年有一篇「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階段」的講演，其中有兩段重要的話，（一）是說明致知在於力行，我說：「宇宙間除物質以外還有精神。承認精神的存在，便承認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不過有了良知要能致，如何致良知，即是行，即所謂實現良知，如此所謂良知，纔不致於落空，纔不會流於空疏的唯心論者和機械的唯物論者」。

（二）是說明行的哲學與革命關係的重要：我說：「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纔能創

造一切，所以我們的哲學，唯認知難行易爲唯一的人生哲學，簡言之，唯認行的哲學，爲唯一的人生哲學。所以我們要完成國民革命，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只有實行「難行易的學說」。

自從我提出「行的哲學」這一個名詞以來，自從我提倡力行爲革命者必備的途徑以來，我們同志中間確實已受到多少影響，我們力行的精神提高了，不論在部隊裏，在學校裏，在政治方面和社會方面，都漸漸改變了從前沈滯不進的狀態，打破了徬徨煩悶的心理，大家一齊起來去力行，這本來是我提倡「行的哲學」的本意。可是我留心觀察我們「行」的結果，實在不能使人滿意，大概說起來，不外有幾種現象，一種是祇是行而沒有認清楚我們爲什麼要行以及我們怎樣的去行，結果成爲古人所說的「冥行」。另一種則是進行非常勇銳，開始非常積極，但是受不起挫折，經不起困難，遇到行不通的時候，不是說環境太壞，就是怪他人不好，於是激昂一些的便與人鬧意見生磨擦，和平一些的便因此灰心，結果弄到本題拋荒而生出無謂的枝節，不然就根本沮喪，流於消極，成爲其進銳者其退速。更有一種則是看見人家動起來了，以爲我們唯有以動制動，跟着他也動起來，專爲應付一時的方便，而忘却我們本來的立場和目的。我考究這種現象之所由發生，不能不說是我們同志沒有認識力行的真

諦，沒有認清楚什麼是「行」的意義和性質。因而沒有決心，沒有信心，更沒有耐心的緣故。

照我個人從實際經驗中所得，我以為我們第一步要分清楚「行」和「動」的區別。我們中國的文字因為是單音字，所以一切名詞多半是兩個字連起來，譬如現在我們常常說的「行動」一個名詞，實際就祇是「行」字，這個「行」字所包含的意義，要比普通所說的「動」廣博得多，我們簡直可以說「行」就是「人生」。通常往往將「行動」二字和「思維」相對立，或是和「言論」相對立，其實廣義的講，所謂「思維」和「言論」，祇是「行」的過程，原是包括在「行」的範圍以內，而並不是列於「行」以外的，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間，沒有一天可脫離「行」的範圍，可以說人是在「行」的中間成長，由「行」的中間而充實了人格，而提高了人格，一切聖賢英傑，革命志士，因為能有目的有決心去行，所以能達到他們的志願，完成最高尚的人格。我們要認識「行」的真諦，最好從易經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句話上去體察。因為宇宙間最顯著的現象，亦即是宇宙萬象所由構成的就無過於天體之運行，易經上的註文說：「天行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非至健者不能，君子法之，以自強而不息」，這裏所謂健，就是歷久不磨，經常不變的意思，最剛強也最持久，而且

是最實澈圓滿，吾人取法於天體的運行，就自然奮發興起，匪勉不輟，明白了人生在宇宙間的地位和價值，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這樣就必然做到至誠專一，態度極自然，而步驟極堅定的地步，一天天的向前進取，這就是中庸所說的「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宇宙人類所以能永遠生存，能不斷進步，全賴有此。

因此我們可以明白：「行」與「動」是不同的。「動」並不就是「行」，而「行」則可包括某種的「動」在內。行是經常的，動是臨時的；行是必然的，動是偶然的；行是自發的，動則多半是他發的；行是應乎天理順乎人情的，動是激於外力偶然突發的。所以就本體言「行」較之於「動」，更自然，更平易，就其結果和價值來說；動有善有惡，而行則無不善。行是繼續不斷的，動是隨作隨止的，拿一個譬喻來說：「行」譬如川流不息的現象，孔子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最足以闡明力行不輟的意義，「動」則好比以石激水，將石子投下去了，水就激動起來，擊得猛烈的時候，水勢跳躍，「可使過頽」，其勢是很洶湧的，可是過一下子，這種他力因抵力而消失了，就可以停止下來，所以動是臨時的，正因為動是他發的。我們固不能說所有的「動」都是壞的，但至少可以說「動」的價值沒有像「行」的價值來得大，或者可以說「動」是低級的，而「行」纔是高級的，我們通常說的「衝動

「是一種本能的反射，所謂「盲動」「亂動」乃至於「暴動」，都不外是由於外來的刺激，或他力的「發動」而起，唯其不是自發的，所以沒有軌道，沒有自覺基礎，沒有一定的方向和目的，祇是動一下子，也不問他的結果如何，這樣的動作，動的時候也未始不活躍，動的力量也未始不浩大，可是因為沒有理性作基礎，不是出於自發和自覺，因而動過一番以後便靜止下來，或是歸於消沉和寂滅，好像一口鐘一樣，要待人去敲，纔會振動，纔會鳴響，不去敲了，就靜寂了。這決不是我們革命哲學所要求的力行。因為這樣的動，是沒有經久效果的，是不能推動人生的。

我們所說的「行」，和一般所謂「動起來」的「動」是斷斷乎不可混淆的。上面已經說過，所謂行，祇是天地間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也就是我所說的「實行良知」。雖然一般用語上有所謂「暴行」和「妄行」但還是指行為的結果而言。這種行為，就因為沒有把握住「行」的真意義，祇是發於人欲的衝動或邪說的煽動，所以祇能認為是一種「動」而不是我們所說的「行」。凡是真正的行，他必然是有目的，有軌道，有步調，有系統，而且有一「反之於心而安」的自覺，它必然是正軌的經常的，是周而復始繼續不輟的。拿地球旋轉來說，我們認真的說，就不能說地球是在那裏動，地球的且旋且繞，最能表達出這種現象的

實在是我們古時習語之所謂「運行」。所以我們廣義一些來說明行的本體：他總是有正軌有行程的，在人類的全生活中，凡是生存，成長，發展，以及某階段與階段間的銜接，後一段與前一段之間的準備與補充，無不是行，我們經常生活的寢息食作，都可以包括於行的範圍以內，行的意義，是不分動靜的。整個的行程中間工作是行，游息也是行，作事是行，修養也是「行」。「動」與「靜」在字面上是對立的，現時流行的所謂「動」幾乎絕對否定了「靜」，因之，就不承認所謂安定的重要，實在就真理來說，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可見靜的作用，也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們所說的行的哲學，就無分於動靜，在跡象上看，雖然是有動有靜，但在整個進程中，向外表現發展的時候，固然是行，生機潛蘊成長的時候也是行，祇要合乎天理，順乎正軌，動亦是行，靜亦是行，宇宙與人生，無時而不在行進之中，我們為改善人生而力行，應該認識行是經常的和恆久的。力行中每一階段，或者或隱，無一不在行，亦無一刻是真正休止而不行，亦可以說宇宙皆為「行」的範圍。「行」與「動」應當分別清楚，行是循着軌道朝着目的和方向，繼續不斷，川流不息地，無時無刻，不在他進程之中向前行進的。

說到這裏，我再將行的本義以及行與人生的關係說一說，古人說：「性與生俱來」，我

（以爲「行」爲性之表，所以「行」亦與生俱來，人生在孩提時，一出世就能啼笑飲食，稍爲長大了，就知道視聽言行，等到長成以後無分智愚，總是求生存，求進步，求發展，換一句話說，就是合乎人生的需要。這種種都是「行」的表現，亦就是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而且我以爲人生本性，並不是好逸惡勞的，我們毋寧說勞動與工作乃是人類的天性。我們如果把一個手足活潑的人閑置了起來，不許他行動，不給他一點事做，這個人必定會感覺到十分痛苦。又如工作中所得到的滿足和安慰，助人成就一件事業時的愉快，這也是稍有知識的人所一般具有的，我國沿海一帶的土諺對於農夫工人的勞作，都叫做作生活，「你今天做了生活沒有？」就是問你作了工沒有？我們人生除非是一無能力，有能力就必然要求表現，而且要在利他方面去表現。替別人盡了力，就是小孩子也覺得滿懷得意，即使沒有人誇讚，他自己也覺得非常安樂，由此種種可以證明，人之生也是爲「行」而生，那麼我們的「行」，也應當爲生而「行」，我們生而有良知良能，一般人自幼到老，孜孜兀兀，小一些說無非滿足自己生存的慾望，充實自身生活的內容，推而廣之，就是要爲家族，爲鄉里，爲社會，爲國家爲全人類有所表現或貢獻。因之，我們可以明瞭所謂「生」就是爲人類生活，羣衆生命，民族生存，國民生計而「生」。所謂「行」也應當爲人類生活羣衆生命，民族生存，國民生

計而「行」。人和禽獸的不同，就在於此。古人說：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所謂「懿德」就是自立和立人，這是生民從天性上就俱備了仁愛的德行，所以我說「行」是與生俱來的。

明瞭了行的本義以後，我們要探究行的精神和行的極致。同樣是人生，爲什麼有的成就了救人救世的志願而造成了萬世崇拜的德行，有的不免爲低級慾望所驅使而造成了害人害己的敗德亂行，這就是由於教育與環境不同的緣故。古人說的，「物慾」，就是只求佔有而不重創造，只求享受而不求貢獻，拿總理訓誡的話來說：就是「以奪取爲目的而不以服務爲目的」，這種敗德亂行，是人羣進行的障礙，是我們革命同志所應該竭力避免而且努力掃除的，須知革命的動機是救人，就是利他而不是利己。革命的本務，是「行仁」，就是愛人，而不是害人。我們以革命與「力行」爲天下倡，就是要造成普遍的風氣，恢復人類的本性，亦就是要恢復我們民族固有仁愛的德性。我們不問自身的資性如何，和過去教育環境如何，以及所受不良習染的深淺如何，大家都要當下覺悟，知道行的本能是與生俱來的，聖賢豪傑救人救世的義行，祇是日用常行的擴大，我們也是天地父母所孕育的一個人，祇患不行，決不思其不成，我們要遵循智仁勇三達德來實行我們人生的本務。就是 總理所說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百人之務，至於無

聰明才力者，亦當應「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所以不論是上智的安而行之，不論是卑人的利而行之，不論是資性稍次的勉強而行之，祇要我們由力行而增進我們利他的本能，祇要我們真純專一永不退轉，那就必能達到我們人生「行」的目的，而且這種行，是必容易成功的。我們更要知道所謂「行易」並不是不勞而獲，無爲而治的意思，亦決不是一帆風順，毫無阻礙的，橫在我們人生途中的，正有很多的危險和無數荆棘與障礙。我們力行革命，是有許多地方必要冒險的，而且要決心犧牲的，但是古今來鑿山治水的巨大工程，騰空鑽地的偉大發明，旋乾轉坤濟弱扶傾的革命工作都是我們人類力行所成就，所以問題完全在我們有沒有貫徹始終的決心和自強不息的精神。如果有此種精神，那末，無論遇到什麼危險，就能「處危若安」，「履險如夷」。凡是常人所視爲困難危險的事，真正的革命黨員，就以爲是平常之事，這就因爲他有「行」的精神，這個革命的精神，只要是他分內之事，只要是他主義信仰和職責所在，就是到了顛沛流離，乃至赴湯蹈火的時候，亦能泰然自如，無所謂難，更無所謂畏，這樣的去行，還有什麼不容易呢？因之，我們「行」的出發點，祇要是發乎天性，出乎至誠，是利他而不是利己，是救人而不是害人，那末所謂「誠者物之始終」，開始的時候，就已伏有最後成功的因素，循此而行，前進不輟，就不見有什麼難行之事，亦決沒有

不成功的道理。所以我們行事，只要以至誠去力行，就必能篤行實行，唯有篤行實行，才能算是行，這樣的行，才能事事精益求精，實事求事，且必始終專一，貫徹到底，就決不會有粉飾張皇，苟且敷衍的習氣，這樣的力行，才能不畏難，唯有不畏難的去行，就覺得「行易」，所以只有力行，才是「易行」，不然好逸惡勞，畏難却願，不肯動手，那就無事不難了。所以古人說，天下無難事，天下無易事，統是這個道理，我所說的「平時即戰時，戰時即平時」亦就是這個道理。其次要研究我們行的目的是什麼？這我可簡單總括的答覆一個「仁」字。我們所行的就是在行「仁」。仁是本乎大公，出乎至誠。所以知之出乎誠者必智，行之出乎誠者必勇，智者之知必知仁，勇者之行必行仁。而且其行必篤，其知必致，其知其行，斷無不成，古人所謂「誠者成也」，又謂「不誠無物」就是此意。若以心理學言之，人生之誠，就是電子之熱，電子無熱就不能生電力，沒有力就不能生電光，如果人生沒有「熱誠」之誠，則智仁勇三達德，也無從發生，無從表現，沒有智仁勇達德之力，來實行三民主義，那麼主義也必不能完成，所以我們要發揚三民主義的光輝，亦必要有出乎至誠的國民革命的行動，然後才能實現。誠是從什麼地方發出來的呢？簡單說：「能公必能誠」，我們國民革命的宗旨，就是要打破個人利己主義，而要救最痛苦的人民，最危急的國家，所以是以利他

爲目的的。所以我們今日要完成主義，要盡人類一分子的責任，求得人生最完滿的境界，我們的所作所行，皆要本乎至誠。如此，我們所貢獻的勞力，所貢獻的智慧，乃能創造，能進取，能建設。能有意義，乃能把定天下爲公的民生哲學，確定了思想，認清了方向，就我們的本性，發揮我們的良知良能，決心力行，坦白勇敢，一往無前，充其行之極致，就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亦是甘之如飴，無所畏懼，古人所謂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這是我們力行的本義。這樣力行，就是革命，亦唯有真正革命的行爲，方能表現力行的意義。這就是我們革命者爲實行三民主義救國救世惟一的精神！總之「誠」是行的原動力，有了誠，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有了誠，就是一心不亂的去行仁，不知道有什麼艱難和危險，很平易的做去，做到成功爲止。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在革命運動上的意義，亦就在於此。

以上大概說明了行的本義與內容。我們的職務地位和工作種類各各不同，但是爲實踐人生本務，完成革命目的，我們沒有一個人不應該力行。然而我們力行的時候，應該要知道「行」有「行」的法則。所以必須具備下面的要件：（一）必須有起點，（二）必須有順序，（亦即有系統，有條理，有計劃，就是科學的），（三）必須有目的，（四）必須是經常的

恆久的。所謂有起點，就是說我們在規定計劃之始，要找到從何處着手，是最自然最便捷最容易收效，我們求學是如此，做事是如此，革命力行也是如此。古人所請「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這卑與邇，就是起點的一種。如果起點選擇錯誤了，雖然認定了方向，也終於不能達到目的地和終點的。又如做一件工作，只知好高騖遠或忽近圖遠，或想投機取巧，單從中途截取一段，越級開始，而不從基層工作着手做起，這是決不能有所成就的。所謂有順序，就是說我們不能祇憑血氣之勇，或是激於一時的意氣，去行，這樣的行，到了中途，必然會遇到始料所不及的阻礙的，遇到阻礙了，事前沒有準備到，我們就會倉皇失措，於是明明是行，而結果就會變成盲動或暴動，所以我們在未行之始，必須確立計劃，規定順序，一切要有預備，要有估計而且所定的計劃，更必須注重時間與空間確定其數目和質量，既定之後很安詳的照着去作，隨時進行，隨時檢查，自然能日起有功。我們能預定計劃，就會在實行之先，認清時間和環境，認清質量和數字，分析本身的內容，事事照到科學的原則，應用分工合作的方法，而因時因地因人因事各得其宜，有了順序和步驟，就不致先後倒置，凌亂失次，緩其所急，急其所緩，就可以穩重確實，做一天有一天的效果，行一步有一步的進程，這樣，我們就不會有所謂行不通的事，也不會有行不通了而灰心下來。所謂有目的，就是

說我們必須有正大光明的目標，目標確定了，朝着這個方向，灼然不惑的向前做去，我們無論擔任或大或小的工作，必須在總目標之下定出我們工作的目的，就是說我們要做到怎樣才算完成；我們每件工作入手之始是起點，而目的就是我們這件工作的終點，我們要抱定目的，一心力行，不達目的，決不中止。最後所謂必須是經常的恆久的，這個意義更爲重要，我在開始時說明「勳」與「行」的區別，主旨就在於此，我所謂經常的力行，就是說「行」的本身，應該是正軌的，就是要有程序的，要有目的的，這種的行，就是革命之行，這種行的力量，就是革命的力量。換言之，革命的行動，是始終無間貫徹到底。革命的力量是日積月累，自強不息的。這樣的行，才是我們民族固有的德行，遵守着這個德行，必能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亦惟有這樣的力行，才能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地位，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的任務。須知我們革命建國是堂堂正正的大道，是順乎天理應乎人心的行爲，決不是什麼出奇取巧的舉動，也用不着別出心裁的方法，更不可有投機取巧，害人利己的私圖。我們有的是非常的精神，但做的却是正常的事業，而用的還是科學的方法，凡是背理滅性，超越常情的行爲，和不合科學不合邏輯的方法，結果只有橫生障礙，害人自害，決非革命的行爲，亦決不能成功的。古人說：「庸德之行」，這個「庸」字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實實的意思，我們要

革命，必須力行，要力行不懈，行之有效，就要確認我們的行是經常的努力，不是非常的舉動，而且唯其是經常的，所以能夠是恆久的，亦唯其是經常的，所以必然是容易的。曾文正說：「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簡捷又要精到」所謂無聲無臭，並不是槁木死灰，乃是十分篤實，十分誠樸，自甘黯淡，絕不誇耀矜張的意思。我們要革命成功，要有自居於無名英雄的志氣，冒險犯難，視作平常茹苦含辛，行所無事，這樣才能夠接近民衆，救濟人類，我們的革命事業，才是可大可久，我們工作，才能持之以恆。總之，我們要事業成功，必須不間斷，不中輟，不達目的，決不終止，生活一天，力行一天，循着自然的道理，和人生的本務，埋頭做去。曾文正立志箴所說：「棄天而快，是及凶災……一息尙存，永矢勿諉」，就是說我們要立志，就要矢勤矢勇，不好辜負天賦，自甘荒佚。有恆箴更說得透澈，所謂「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就是說你每日三餐普通飲食，倒不會失時，何以做事反要爲外物所遷而間斷中輟呢？我們真要達到有志竟成的目的，就不可不以立志有恆自勉，這立志有恆，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真意。

上面是說明我們如何力行的要旨，最後我要提示大家，我們總要篤信「總理」行易知難」的學說，我們要知道力行之效，是從「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的認識上出發的。革命

大義，本來如日月經天一樣的明白，我們體會得愈確實，那末實行時必愈勇敢，而且一切方略程序，總理都已經爲我們詳細的訂定了，我們祇須按照方略，依着實行，各就性行學識之所宜，確定計劃步驟，本乎良知良能，竭盡我們救國救民的本職，勇往積極的去做，就必然能達到目的。我還可以補充一句，要解決「知難」的問題，也唯有從力行中去求，總理說：「能知必能行」，我還要續一句「不行不能知」，因爲我們都是後知後覺，我們除了基本的革命大義以外所知的實在是有有限，因此我們一方面固然應當竭力求知，同時還應該從力行中去求真知，凡是我學問經驗中認爲已經獲得的知識，如果不是經過實行而證明爲有效，就不能斷定所知者果爲真知，所以我們一切的事業，必須實行而後始有真知，也唯有能行而後能知。大學所謂「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這就是力行的效果，也就是革命成功的方法。如果經過實行或實驗以後，而我們就可以察覺從前所認爲已知者，其實不是真知，這樣我們就可以擴充我們知識見解的範圍，就與獲得真正的知識一樣，所謂「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有所捨就必定有所獲，世上最確實的求知方法，就無過於此了。我深深感覺到抗戰建國革命事業的艱鉅，我又感於我們同志近來志願力行的踴躍，今天特地將力行真諦，和如何力行始能成功成德的道理，

貢獻給大家，希望大家認清要旨，立定決心，勿爲動盪的現象所搖惑，勿與盲動或亂動相混淆，卽行求知，不懈不輟，慎思明辨，貫以篤行，中庸上說：「有勿行，行之勿篤勿措也」，所謂篤就是貫徹到底，完滿達成的意思，像這樣的篤行，才能說是力行，亦才能算是革命。我們同志照我上面所說的道理切實反省一番，就知道我們從前一般所行的不是真的行，就不是力行，所以我們事多不成。唯其我們不會真正的力行，所以要視革命事業爲畏途而認爲難行。那裏知道革命並不是難行，祇是我們沒有決心，沒有熱誠去力行，沒有堅決的信仰去篤行緣故。古諺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又說「事在人爲」，這二句話是我們幾千年來民間傳說的老話，這就更可以證明「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只是對於空疏怠惰的惡習慣的一句箴言，而「行之匪艱」却是我們民族普遍認識的真理。所以我們以後革命立業，無論抗戰，無論建國，只要下定決心，只要抱着熱誠，只要照着我們信仰去力行，我敢斷言，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而我們革命的使命，必能容易達成，亦就可不言而喻了。

# 革命與哲學

——蔣委員長著——

實價國幣肆角五分

編者 劉

嬰

出版者 戰時出版社

總經售 各地五五書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出版

10  
442451

(17)

10

442451

(17)

#